



《记忆》八十七期

目录

【专稿】

王 锐 毛泽东与文革小报（附全书目录）

【博士论文】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三）

【评论】

范世涛 关于高万春之死及其他

【读书】

印红标 让史实现身，以真相示人——评余汝信的新书《香港，一九六七》

陈竞新、江雁南 周恩来领导香港“六七事件”——评《香港，一九六七》

【序与跋】

余汝信 《香港，一九六七》序言

【书摘】

《香港，一九六七》第三章 冲击 三、孟秋江之死

《香港，一九六七》结语：启示与反思 三、周恩来领导了“反英抗暴”全过程

【书讯】

孟友楼 马文蔚著《难忘的“现反”经历：1966—1979》一书问世

向胡杨 余汝信新著《香港，一九六七》在香港出版

【检讨与揭发】

李慎之 胡乔木和吴冷西的关系（1968-9-12）（李三达提供）

【资料】

任冬林整理 土改运动（三）

【编读往来】

1、阎长贵、宫婷婷谈唐伟的文章

2、补正：李慎之《交代我和吴冷西的关系并揭发吴冷西的反动言行》一文的写作时间

【专稿】

按：此文取自王锐先生的《文革小报兴亡史》一书的第四章，《文革小报兴亡史》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文革小报的学术专著。作者从文革小报的界定入手，对其兴起、发展的主客观因素，报名、品种、分类、内容、特色，毛泽东、中央文革对之所持的态度及其衰亡没落之原因等诸多问题，做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全书共26章40余万字，并配有大量图片。



王锐先生是国内知名文革小报收藏家及研究者，近年出版有《灵感毒药》、《波光洞穿》等著作，发表有《“安亭事件”的再认识和再探讨》、《文革中的〈伯达文选〉》、《遇罗克的处决令是谁签署的》、《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等文。这部《文革小报兴亡史》是作者经十多年之努力，在占有大量实物的基础上，潜心研究的结果。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此书虽为国内多家出版社所青睐，但迄今未能付梓。本刊首发，意在推动此书的出版。

毛泽东与文革小报

王 锐

1、王力说：“毛主席最注意造反派的报纸”

以“革命造反”为主旨的红卫兵造反派办的文革小报，之所以在“文革”一段特定的时间大行其道，究其深层原因，可以说这与毛泽东本人对红卫兵小报为代表的造反派报纸一度持肯定、赞成，甚至欣赏的态度不无关系。笔者以为，毛泽东与文革小报的关系，是一个至今仍值得深入研究探索的课题。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于1967年1月的一次谈话，其中就提到毛泽东对文革小报的态度。不过，当时尚没有“文革小报”这种说法（“文革小报”这种称谓，是后世的人们回顾评价“文革”时期这一特殊现象时，才开始使用并流行开的）。王力讲话中用的是“造反派的报纸”，这一带有点官方色彩的提法。

1967年1月24日凌晨，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日报》社的造反派代

表及相关人员，主要谈所谓“《北京日报》的新生”问题。其时，自1月初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夺权，并获毛泽东肯定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报，大部分被红卫兵进驻或造反派夺权，宣布“新生”。作为新北京市委机关报的《北京日报》也难逃被接管改版的命运。王力这次接见谈话，就是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对“新生的《北京日报》”表态的。

王力此时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般成员，而是身兼由毛泽东直接任命的“中央宣传组”的组长重要职务。1月8日，毛泽东在其住处亲自召集有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高层会议，当时，“文革”开始后一直掌握中央宣传口，执掌舆论大权的中央第4号人物陶铸已于几天前被打倒靠边。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在会上宣布成立中央宣传组，并当场宣布其成员为王力、唐平铸、胡痴，由王力任组长，并立即让王力等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王力这种新身份，有点类似后来的姚文元，而所不同的是，他此时直接对毛泽东本人负责。

王力在讲话中，对主持新《北京日报》的人员说：报办起来了，大家要共同把报纸办好。毛主席最注意造反派的报纸，你们要把报纸办好。你们同北师大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团结起来。¹

王力讲话中提到的“造反的报纸”，显然是指红卫兵造反派办的文革小报。以王力当时位居高层核心的身份和毛泽东对他的赏识信任推断，这番话的可靠性很大。况且，“文革”时期那种政治背景，不用说伪造、生编，哪怕是仅仅对毛泽东的原话指示修改几个字，也将面临牢狱之灾。身居高位的王力，当然更明白这种利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王力这里传达的，是真实表达了毛泽东当时对造反派小报，有所喜好或者说有所偏好的立场态度。

同时，笔者以为，这也符合毛泽东一贯的观点和主张。其实，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与小报有某种不解之缘。早在当年的中央苏区以及延安时代，毛泽东就很注意各种小报，经常找一些小报来阅读，并从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以至拓展自己的思路。据记载，对国民党的小报，毛泽东就经常找来看，而且往往从小报上的一些政治新闻中，分析出我党在国统区的活动情况，以及民主人士同国民党当局斗争的情况。

¹ 《红旗》（上海版）5期，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1967年1月31日。

在延安，毛泽东除关心《解放日报》外，对延安边区发行的小报也很重视。当年延安边区有一份《边区群众报》的小报，据说，这份小报后来改为用四号字排印，就是直接来自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关注小报，当然是认为小报比较能反映来自群众的声音。那时，关中地委办有一份8开的油印小报，毛泽东几乎是每期都看。有一次，他从这份小报上看到刊载的文章上反映出边区群众的某些要求，当即将这份小报寄给博古和陆定一，并用红笔写下眉批，称赞小报上刊载的两篇文章。说文章写得精辟，有独到见解，是大报上很难看到的好文章，不妨转载在《解放日报》上。后来，《解放日报》果然转载了油印小报上那两篇文章。¹毛泽东这种对小报格外的兴趣和关注，一直延续到文革时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

与遇罗文一起创办《中学文革报》并刊发遇罗克《出身论》的牟志京，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文革某段时期，毛泽东每天必看数份最新出刊的“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并将此事交中央文革具体办理，而中央文革又将此任务布置给“首都三司”，由“首都三司”宣传部长负责荐报找报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

牟志京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曾向我索取全套的《中学文革报》，讲他受中央文革之托，要为毛泽东准备八份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我们的报纸应在此列。”²

毛泽东对造反派报纸的态度，对文革小报的存在和发展，可说是决定性的，极为关键和重要。

2、毛泽东不赞成《百丑图》

毛泽东对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持支持和赞赏态度，但是并不表明他对这些小报，以及红卫兵过分搞法，持完全的支持与肯定。事实上，对当时流行一时的所谓“革命造反行动”，如“挂黑牌”、“戴高帽子”、“搞喷气式”等过火行动，毛泽东是持否定立场的，甚至提出过尖锐批评。

表现在其时已十分风行造反派小报和传单方面，毛泽东对其中过火的东西，是持强烈批评反对态度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那幅著名的漫画《百丑图》（又名

¹ 《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第261页，孙定义编，知识出版社1993年1月。

² 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24页，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

《群丑图》)。

《群丑图》是北京的一批红卫兵以“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名义搞出的一幅大型政治漫画，最早出现在“首都二司”机关报《东方红》第21期上。其中，对一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大批知名人士予以集中批判攻击，极尽丑化污蔑。面世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流传甚广。¹

然而，这幅《百丑图》传到毛泽东那里后，却引起了他的不满以至愤怒，对其做了尖锐批评指责。

有意将《百丑图》透露给毛泽东，并让其对红卫兵造反派一些做法提出批评指责的，是其时身任北京卫戍司令的傅崇碧将军。文革后，傅崇碧在其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事情经过。

正在紧张的时刻，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到主席那里去一趟。我就问
让不让去？江青说快去吧！我到达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已是夜里两点多了。
毛主席还在游泳。我坐了半小时，毛主席从游泳池出来了。见到我，主席说：
“先吃饭吧，解决‘民生’问题。吃了饭再谈。”

饭送上来，毛主席叫我一起吃。吃完了饭，主席问我：

“北京现在的情况怎样？”

我说：“很乱。”

主席问：“街上大字报还多不多？”

我说：“很多。”

主席问：“砸烂‘猪头’（指朱总司令）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我说：“有。”

主席说：“这不好！猪、毛不能分。没有猪（朱），哪有毛？”

主席又问：“现在还有武斗吗？”

我说：“大的没有，小的还有。”

主席说：“在工人阶级中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搞联合，要团结，
要搞生产。工人不搞生产，学生不上课，不行。”

说到这里，主席看我放在面前一大卷纸，主席问：“那是什么？”

¹ 《群丑图》最早刊载于《东方红》第21期第3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编，1967年2月22日。

我说从钓鱼台出来时，有人拦我的车子，放进车里的，是什么我还没看。

主席说：“打开我们看看。”

一打开，是一张彩印的大漫画“百丑图”。（笔者注：这里傅崇碧的记忆稍有纠正处，那份刊有《群丑图》的小报，是套红印刷而非“彩印”。当时印刷水平，中国尚无彩印报纸）主席看到上面画的是贺龙等领导同志抬着刘少奇，罗瑞卿口内含着刀，许多被丑化了的党政军高级领导跟随在后。主席生气地说：“这是在丑化我们的党！这种东西不准搞！”主席马上叫秘书打电话给陈伯达，要他把此图全部收起来，不准在社会上流传。我趁此时机告诉主席说：“现在批斗老干部比以前更厉害了，还要老干部坐‘喷气式飞机’。”

主席问：“什么叫‘喷气式’？”

我就比划给主席看。主席说：“这样做不好！”¹

毛泽东发了话，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正式传出消息，对《百丑图》予以抨击并不准其它小报再转载，已发行的小报要收缴销毁。可见，毛泽东虽然对大字报及红卫兵小报持支持肯定态度，但对其中一些过分的东西和做法，仍然是不赞成甚至明确表示反对的。

另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还反对小报刊登批斗“走资派”时戴高帽子的照片。王力在其《回忆录》中说：“还有他提出不准戴高帽子、剃头、游街。²在军委八条以前他就这样提了。主席明确说：‘这是属于武斗范围’。总理反映过，我也反映过香港报纸刊登了王任重、曹荻秋戴高帽子的照片。主席叫我代中央写一个通知，叫各地的小报不许登戴高帽子的照片。”³

当然，由于中央文革小组一帮人暗中的支持撑腰，以及当时全社会掀起的打倒刘邓及其在各地各部门的所谓“代理人”的狂潮，尽管毛泽东明确批评反对《百丑图》这种很恶意的攻击丑化，以及小报刊登戴高帽子等人身侮辱性照片，但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上用漫画丑化“刘、邓、陶”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省市领导的做法，以及戴高帽，搞喷气式等行为，并未真正得到制止。正如王力也

¹ 《傅崇碧回忆录》，第198页，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

² 引者注：此处的“他”及下文的“主席”，均指毛泽东

³ 王力：《“文革”第一年》，载《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承认的：“这些指示的效果很小。”各类千奇百怪的漫画，以及批斗照片，仍不断充斥于首都及外省市的小报中，并构成其特色之一。

3、毛泽东指示转载《首都红卫兵》社论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下联合起来》的通栏标题下，一共发表了4篇红卫兵及造反派的文章。整个第二版被冠以“革命造反战地”，并配以木刻版画的题花，十分令人瞩目。

头条位置即是署名“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是出自造反精神最强，造反劲头最足的“首都三司”名下，却一反当时火药味十足，张口“炮轰打倒”，闭口“砸烂狗头”之类流行的造反派腔调，而是多少有些和风细语地谈革命造反心得，说学习毛著体会（《人民日报》通栏标题之下还有个副标题：《——学习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体会》）。更让人称奇的是，“首都三司”这篇文章的矛头，对准的既不是党内走资派，也不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对准了造反派自己。

文章在历数了“私”字在革命造反派队伍内部的种种表现后说：“这个‘私’字，就是很多同志头脑里的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头脑里同样进行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权’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也就是说，不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我们头脑里的司令部的话，那么，即使我们把权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过来，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¹

这篇文章甚至还耸人听闻地宣称：“阶级敌人在拼命地寻找着我们队伍内的每一点缝隙，挑拨、离间、破坏革命派的大联合。”而对造反派来说，“我们将怎样回答敌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钢铁般的大联合！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最后，“首都三司”的文章号召：“打倒风头主义！打倒本位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干部及一切革命群众联合起来！”²

其实，“首都三司”这篇文章，是其机关报《首都红卫兵》几天前（1月26日）发表的一篇社论。在“一月风暴”高潮中，“首都三司”发表这种内容的社

¹ 《人民日报》，1967年1月31日。

² 《人民日报》，1967年1月31日。

论，是否有什么背景（比如说奉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的指示而为），不得而知。不过，《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上作全文转载，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举动，其实是有其背景和内幕的：原来，这完全是奉毛泽东的指令而为之。

据说，毛泽东是见到自己书房案头上摆着的这份《首都红卫兵》小报，一眼望见这篇社论的标题，为之所吸引，坐下来一口气从头到尾读完，不觉为之叫好。又当即叫来主管《人民日报》的陈伯达，指示其立即在《人民日报》上作全文转载。¹推测毛泽东这一不寻常的动机，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目睹“一月风暴”夺权高潮的来临，毛泽东大概认为文化大革命大局已定，现在值得关注的，不再是对立派，而应当是即将全面接管政权的造反派内部的问题及其整顿，否则这些被一度寄与重望的年轻闯将可能接不好班。

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了毛泽东对红卫兵造反派小报的看重（当然也与江青、陈伯达等人当时的极力推荐有关）。如果不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发了话，是没有人大胆敢把红卫兵造反派这种一向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小报，连同诸多反映党和国家军机大事的文件报告一起送上毛泽东书房的案头的。

正由于毛泽东发了话，表明了对造反派小报的欣赏态度，作为党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当天在全文转载《首都红卫兵》这篇社论的同时，还转载了北京有名造反组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夺权必须联合》，上海工总司下属的上钢二厂革命造反工学联合兵团的《联合起来就是好》，以及署名“红枪手”的《‘私’字是阻碍革命大联合的绊脚石》等3篇造反派文章，这些也都是从文革小报上选载的。同时，还用“人民日报社”的名义刊载了那个关于“征求全国革命造反派办的报纸的《启事》”。正如前面已论述过的那样，《人民日报》社这则《启事》，对文革小报的“发展繁荣”，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一切，显然都与毛泽东对之持欣赏肯定态度有关。

4、上海《鲁迅兵团》何以大出风头？

在《人民日报》转载《首都红卫兵》社论之后仅仅20余天的196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头条位置用特大字号通栏标题的醒目编排手法，转

¹ 《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原载《重大决策档案往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10月。

载了也是来自造反派小报的文章：《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这篇文章的原文刊载于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主办的小报《体育战报》第4期，作者为鲁迅兵团下属的“东方红战斗队”。

如果说，20多天前，《人民日报》转载的“首都三司”等4篇来自造反派小报的文章，版面仅仅安排在第三版，且无“编者按”，也没配发“短评”之类，还显得规格不够，缺乏某种权威性、震撼性的话，这次转载上海《体育战报》的这篇造反派文章，则是用上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规格。不仅《人民日报》用醒目的黑体字加了一段引人瞩目的“编者按”，而且在第一版右下部分转载了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1967年第4期为此专发的“短评”：《推荐两篇好文章》。（《人民日报》第一版同时转载的还有上海《体育战报》第4期评论员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人民日报》这个编者按说：“今天，本报刊登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同时，刊登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这两篇文章，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过程中，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两篇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范例。”这个“编者按”还带号召性地说：“这两篇文章，值得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注意，并结合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地学习和研究。”¹

《红旗》杂志“短评”更是高度评价：“是两篇好文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个好范例。他们‘有的放矢’，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本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值得全国各地的革命小将学习的，同样也是值得革命的老干部学习的。”又说：“这两篇文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带有普遍性的。他们提得及时，切中要害。”最后，《红旗》短评向全国亿万红卫兵和学生发出呼吁：“革命小将们，我们一定要为无产阶级争气，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气，说到做到，认真地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

¹ 《人民日报》，1967年2月26日。

界觀，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¹

魯迅兵团東方紅戰鬥隊這張所謂的大字報長達數千字。其實它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大字報，倒像是一篇充滿極左詞彙和說教意味的文革論文，除長達1000多字的引言導論外，共分為“反對單純軍事觀點，突出思想革命”、“反對‘材料挂帥’，打‘人民戰爭’”、“徹底粉碎反革命經濟主義，节约鬧革命”、“反對关门主義，團結大多數”、“整頓思想，向‘私’字開刀”等5個部分。《人民日報》轉載時，不單用頭版头条顯著位置，而且是不惜篇幅，除第一版上半版外，還用上了第三版一個整版才全部裝完（新華社已于前一天的2月25日向國內外發了通稿）。通讀這張大字報全文，其實深感內容空洞，言辭啰嗦，全篇談不上有什么新意，也並無什么實質性的內容。其主題，不過是講造反派在奪了權掌了權後，應如何重視和面對自己隊伍內部存在的種種問題，並提出對策，即克服“私”字，進行整風。無論按現在還是當時的標準，這都是一篇冗長乏味，令人難以卒讀的說教文章。然而，一向代表中央聲音的三大宣傳媒體，新華社、《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也包括當時影響極大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此文竟如此看重，不約而同地一齊刊發轉播，為之喝彩叫好。這是很不尋常，也很令人矚目的。

說起來，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魯迅兵团，在被稱為“一月革命”發源地，“一月風暴”的上海，无论實力，還是其聲名影響，都排不上档次，充其量算個二、三流造反組織。《體育戰報》在上海眾多造反小報中，也屬於很不起眼那一類。筆者就收藏有數十期當年的上海《體育戰報》（包括《人民日報》所轉載有“東方紅”大字報及評論員文章那期），不用說與工總司的《工人造反報》以及《紅衛戰報》、《上海紅衛兵》相比，就期刊規模、版式、印刷，以及文章內容來看，可謂皆覺平常，甚至乏善可陳。《人民日報》等中央喉舌對該報該文竟是如此看重，也簡直是讓人困惑讓人吃驚了。據說，當年上海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中，就不僅有人眼紅，有人羨慕嫉妒，還有人不服氣，甚至憤憤不平，暗地里議論：“魯迅兵团算老几？東方紅戰鬥隊算老几？”

不過，不久就有小道消息傳了出來，此番不尋常的安排和舉措，不僅來自党中央，而且還直接來自“偉大領袖毛主席”。這下，除了表示堅決緊跟照辦，沒有人再敢對此表示不平甚至不敬了。否則就是“炮打”，弄不好會入監下獄。

¹ 《紅旗》雜誌，1967年第4期。

《人民日报》(包括《红旗杂志》及新华社等)这番安排和举措，确实不是陈伯达，也不是江青等中央文革要员可以做主的，甚至也不是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及被称为“副统帅”的林彪可以决定的。它确实是直接来自毛泽东本人的指示。如同当初指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对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样。《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这种规格刊发对待鲁迅兵团“东方红小将”的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亲自发的话，并具体指示要如此高规格，高重视程度地办理，以期引起全党全国上下的一致重视，并予以学习仿效。

对此，陈伯达在当天的一次讲话中，曾有所披露。陈伯达于2月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接见云南地区的造反派时说：“上海发表的《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是毛主席推荐的好文章。文章中所谈的问题是对全国造反派有普遍意义的。全国造反派都要好好学习。¹

从陈伯达这个讲话透露的信息来看，此事的确是奉毛泽东直接指示而为。

正由于此，尽管刊于《体育战报》上的这份大字报文章空洞冗长，全篇满是说教，让人读之味同嚼蜡，那篇评论员文章写得也谈不上精彩，但其迎合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思，所以能获得最高规格的赏识与殊荣。原先名不见经传的上海鲁迅兵团也因此红遍大江南北，一时风光无限。为此，〈体育战报〉还在3月5日出刊的第6期，以头版套红刊载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全文，向远在北京的毛泽东致敬感恩，大表忠心。

至于向来不起眼的这份上海滩小报《体育战报》，是如何摆上毛泽东案头，获得最高领袖一阅，而被看中作典范的，其个中内幕，当时即有几种不同版本。一说是中央文革小组见到这份小报，报给江青，江青阅后推荐给毛泽东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最先见到该文，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张春桥抱着一试的心理，专程从上海带至北京，上呈毛泽东一阅，不料竟大获毛泽东赞赏肯定，张春桥也为之脸上有光。

总之，不管哪个版本属实，这都是毛泽东当年看重小报的一段经典故事。

¹ 《上海通讯简报》第30期，1967年。

5、文革高潮中，毛泽东通过小报了解时局

1967年夏天，“文革”引起的局勢动荡和混乱达到高潮。在这种动荡混乱的高潮之际，毛泽东悄然离京，开始了“文革”中的第一次南巡。

离京前一天，7月12日，毛泽东破例在其住处接见了一位来自家乡的客人，这位来访者就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同学，建国后时任湖南副省长的著名人士周世钊。那天，两位老同学多年不见，毛泽东谈兴极佳，一气谈了3个小时。周世钊却没有毛泽东那种谈兴和好心情，他对文革时局忧心忡忡，这次就是专程赴京，设法求见毛泽东，当面汇报湖南日益严重的局势的。而毛泽东面对老同学，谈的更多的是家常话。

周世钊这次最想对毛泽东谈的是当前的文革形势，以及对文革中造反派一些搞法的不同看法，尤其是湖南两派武斗引发的严重局势。但毛泽东话题不往这方面说，他也不好贸然行事。想了想，略作斟酌地说，来京后，多数时间是在饭店房间里看看书报，有时也出去走一走。又说，北京饭店大门东边就面对王府井大街的南口，那里每天都有人在卖全国各地的文革小报。自己经过那里，有时也买上几份带回饭店消磨时间，也借此了解各地文革运动的一些情况。

听到周世钊谈起文革小报，毛泽东似乎来了兴趣，问周世钊近来从小报上可读到些什么重要消息。周世钊说，倒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只是小报有些写法，倒是觉得有趣。比如说到武斗吧，小报上近来有不少这方面的报导。但报导时，大多数都像是过去战争年代发急电的方式来表达，比如，“某某地方告急，急急急，十万火急！”等等。

毛泽东闻言一笑，说，是呀，动不动就是十万火急，让他们告急去。不过，我看急也急不了多久，总会要想个法子解决问题的。¹

周世钊趁机向毛泽东谈及湖南局势，汇报了上个月发生在省会长沙的“六·六事件”。6月6日，湖南两大对立派“高司”和“工联”在长沙大规模武斗冲突，后果严重。周世钊为了说明情况的严重，讲得很仔细。没想毛泽东对长沙“六·六事件”情况比他还了解得更清楚，具体到东塘是怎么个打法，河西一战又如何如何，讲得周世钊吃惊不小，张大嘴巴说：“主席，你比我还知道得更清楚哇！”

¹ 毛泽东接见周世钊的情况，见《红卫兵小报兴亡录》。

毛泽东又是一笑，说：“我是党中央主席嘛！他们（指中央文革小组）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说完又遥指办公桌案头，对周世钊解释道，“你看，我那办公桌上，不是也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就是从小报上知道的。”

周世钊抬眼望去，毛泽东书房一角宽大的办公桌上，果然堆着放着一大迭报纸，形形色色，大小不一，正是当时流行的各类红卫兵造反派小报。

与周世钊谈话后的第二天深夜，毛泽东在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等人的陪同下，乘专列秘密离京作南巡视察。

9月中旬，毛泽东来到南昌，这是他此次为时两个多月南巡的最后一站。在听取各方汇报之前，毛泽东仍不忘先从当地文革小报中先获取第一手材料。以便接见谈话时心中有数。江西及省城南昌当时比较有名气的小报是《火线战报》。

《火线战报》是在省城南昌及江西全省都颇有影响的红卫兵主流小报，最初由南昌各高等院校（包括党校、团校、江西共大等）各小报编辑部联办，后来改为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主办，一直持续办到1969年上半年，共出刊300多期，在全国各省市红卫兵小报中也算为数不多的出刊时间长，出刊期数多的报纸之一。毛泽东要看江西的文革小报，《火线战报》自然是首选。

9月17日，毛泽东接见以程世清为首的江西省革筹小组全体成员。当程世清等汇报到南昌武斗情况时，毛泽东突然发问说：“《火线战报》上说，‘南钢失守，庐山失守’，是否有这回事？已经收复了吗？”一席话，问得程世清等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¹

程世清汇报中还谈到解放军某部战士李文忠“支左爱民模范排”，为抢救群众而英勇献身的光荣事迹时，毛泽东点点头，颇为惋惜地说：“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²

后来，李文忠“爱民模范排”的事迹，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重要媒体广泛宣传了好些时候，这当然是毛泽东返京后发了话的缘故。毛泽东对文革小报的关注和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6、毛泽东对外宾畅谈文革小报

¹ 《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26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² 同上。

文革中，毛泽东频繁地接见来访的外国朋友及共产党领导人。会见中，毛泽东不仅向外宾谈及中国文革形势及相关情况，而且还多次兴致勃勃地向外宾提起中国当时特有的“文革小报”。

1967年6月6日，毛泽东在人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锡兰（现斯里兰卡）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桑木加塔桑率领的锡兰共产党代表团，陪同者，有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等。会见中，在谈及中国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也可能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群众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指文革前）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¹

之后，毛泽东突然将话题引到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方面上来，对几位外宾问道：“（北京）地质学院有个《东方红报》，你看到了吗？”

桑木加塔桑点点头说：“我看到了。”稍停，又继续说，“听说，它的销量达10万份，有时甚至超过10万。是这样的吗？”

在座的康生点头证实确实如此。

桑木加塔桑对此也显得很有兴致，望着毛泽东说：“在上海时，我曾向上海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最好把全中国的报纸（指文革小报）销量统计一下，我想这个数字可能会很大。大概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销量总数还要多。”

毛泽东笑着点头说：“这些报纸（指文革小报）何止几百种？大概有几千种。我这里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

从毛泽东这番话及谈话的语气、神情看，他对中国当时竟能有几千种小报诞生于文革中，是表示欣赏和肯定赞同的。认为这至少也是“新生事物”，甚至是一个“创举”。

当年10月中旬，毛泽东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其中也多次提到造反派、红卫兵办的小报，对其带有肯定赞成的意思。

不过，毛泽东对文革小报的态度，后来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以及文革进程中种种弊端的暴露，毛泽东对红卫兵及其小报的态度，

¹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逐渐发生了由肯定赞赏到基本持否定批判的较大转变。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九大”之后接着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作了一次内容比较广泛也比较重要的讲话。讲话最后，就涉及“红卫兵小报”问题。毛泽东说：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了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¹

这里，毛泽东不仅将“红卫兵小报”视作泄密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且将其与已被打倒的“王、关、戚”“杨、余、傅”（“杨余傅事件”为冤案）等“敌对人物”联系起来，说明毛泽东对“红卫兵小报”已基本持否定态度。前后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7、毛泽东笑谈“乔老爷”街头卖小报

“乔老爷”，即乔冠华，系人民共和国在海内外颇有知名度的外交才子。对其外交家风度和卓越才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层均极为赏识。

那是1967年夏天的事。其时，外交部造反派为夺外交部的权，掀起了“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高潮。为显示造反派的威信与战斗力，一些人逼迫姬鹏飞和乔冠华两位副部长，到北京最热闹的地方去卖造反派办的小报。这些小报全是打倒他们自己的内容。造反派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两位“走资派”当众丢脸。乔冠华两人明白造反派的用意，就说自己目前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在街头上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是否可以换个地点。造反派却不肯答应。乔冠华分配的卖报地点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开头几

¹ 《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26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天，都有造反派押着监督。后来，这些造反派大约也嫌麻烦，也看乔老爷卖报还算守规矩，就把一摞小报交给乔冠华，令其自个卖完后回外交部交帐。如此过了两天，聪明的“乔老爷”立即想出一个巧妙办法，糊弄不再监督他的造反派。他每天点齐交来的小报份数，按每份2分钱的单价算出报款，待监视的造反派前脚转身离开，他后脚就溜之大吉，找家僻静街头小酒馆喝啤酒解闷去了。待几个小时后，才慢悠悠走回外交部，将换来的零钱作报款上交，谎称小报已全部卖光，每次还有意多交几角钱。惹得不明内情的造反派很开心，还夸他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很会卖报赚钱啊！”善于幽默的乔老爷脸上诺诺，心里窃笑不已。¹

后来，这个“乔老爷王府井卖报赚钱”的笑话，在外交部内外慢慢流传开了。这时，造反派已失势倒台，乔冠华等领导也逐渐复出，知道其内情后，当年那些造反派也莫可如何。此故事流传甚广，直至传到毛泽东那里。

1973年春，中国面临文革以来最好的外交形势，中美、中日关系都出现了新的格局。4月，廖承志率领自中日建交以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访日，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带人赴华盛顿商议建立“驻美联络处”事宜，正下榻著名的“五月花”饭店。这天，乔冠华代表中国政府，同美国助理国务卿詹金斯在北京谈判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事宜。一天的会谈进展顺利，乔冠华很开心，返中方住地后，兴致未减，顺口吟了几句打油诗，前三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欢欢喜喜詹金斯”，第4句，他问外交部的同事谁来填写。当时，有人说是“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人又建议改为“洋洋得意乔老爷”，乔冠华都摇头说不满意。之后，也就一笑了之再没议谈过。²

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天，毛泽东在住处亲自召集有周恩来等领导参加的外交部会议，听取中美谈判的情况汇报。因双方谈判进展顺利，毛泽东那天兴致不错，在座者因之也很放松，气氛十分活跃。有人说现在外交形势大好，乔冠华为此诗兴大发，作了三句打油诗，可是第四句尚无结果。毛泽东当即说，“好呀，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众人称好。毛泽东笑着对乔冠华说：“乔老爷，你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是，‘莫道敝人功

¹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² 章含之：《我与乔冠华》第5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8月。

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¹

在座者闻言，无不拍手大笑，原来，毛泽东还记得当年乔冠华王府井街头卖小报，并机智幽默糊弄造反派的轶事。毛泽东在此也颇为幽默地将这个典故，填进乔冠华的打油诗中，为这个本堪一绝的文革故事，再添了精彩的一笔。

不过此时，文革小报除个别特殊例子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已随它的主办者一起，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毛泽东这里当众重提乔老爷街头卖小报的往事，似乎是亲自为文革小报所做出的“最后绝唱”。自那天以后，无论公开接见还是私下谈话，毛泽东似乎再没提到过文革小报。

附：《文革小报兴亡史》目录

第一章 文革小报的界定和鉴别

- 1、弄明白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小报”至关重要
- 2、文革小报和各级党报“电讯版”的区别
- 3、文革小报和革命委员会机关报的区别
- 4、“文革”时期大专院校的校院报与文革小报的区别
- 5、“文革”时期的企业报、行业报和文革小报的区别
- 6、“文革”时期部门报、机构报与文革小报的区别

第二章 文革小报起源于红卫兵运动

- 1、红卫兵运动横空出世震撼中国
- 2、最早创刊的两份红卫兵小报
- 3、中国革命博物馆“致红卫兵公告”推波助澜
- 4、外省市红卫兵小报发展之路并不平坦
- 5、《欢呼革命的红卫兵报》

第三章 1967年：文革小报的“黄金时代”

- 1、“大动荡”“大夺权”，迎来小报大发展
- 2、各级党报停刊后留下大片新闻“真空”
- 3、《人民日报》“启事”火上加油

¹ 同上，第49页。

- 4、《红旗》杂志也加入征集“小报”行列
- 5、清华《井冈山》和上海《工人造反报》的政治野心
- 6、被小报左右的社会舆论

第四章 毛泽东与文革小报

- 1、王力说：毛主席最注意造反派的报纸
- 2、毛泽东不赞成《百丑图》
- 3、毛泽东指示转载《首都红卫兵》社论
- 4、上海《鲁迅兵团》何以大出风头？
- 5、文革高潮中，毛泽东通过小报了解时局
- 6、毛泽东对外宾畅谈文革小报
- 7、毛泽东笑谈“乔老爷”街头卖小报

第五章 中央领导层对文革小报的态度

- 1、周恩来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
- 2、中央文革小组将小报视为自己控制的“第二舆论”
- 3、江青讲话称“红卫兵小报办得好”
- 4、戚本禹、谢富治代表中央对“小报”问题表态
- 5、中共中央对小报问题发出的正式文件
- 6、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关于小报的讲话

第六章 “创刊号”风景线（一）

- 1、“创刊号”各显神通
 - (1) 因陋就简，随意处理的创刊号
 - (2) 将毛泽东形象与“发刊词”并重的创刊号
 - (3) 全力突出毛泽东形象的创刊号
 - (4) 颂扬毛泽东又同时颂扬林彪的创刊号
 - (5) 颂扬毛泽东并兼及江青的创刊号
- 2、五花八门的“创刊词”
 - (1) 沿用传统称谓的“创刊词”、“发刊词”
 - (2) 另带标题的“创刊词”、“发刊词”
 - (3) 名目繁多的“代发刊词”

- (4) 以《致读者》、《告读者》甚至《编后记》作“发刊词”
- (5) 用社论或署名文章作“创刊词”、“发刊词”
- (6) 其它“代发刊词”种种

第七章 “创刊号”风景线（二）

- 3、文革小报“创刊号”的期号编排
 - (1) 编为“第一期”或“第1号”的创刊号
 - (2) 编号为“红一期”、“红1号”的创刊号
 - (3) 编号为“忠一号”的创刊号
 - (4) 编号为“第一炮”的创刊号

4、异地版创刊号及其特征

- (1) 异地版的创刊及其主办者
- (2) 异地版创刊号的版式特点
- (3) 异地版创刊号大多数没有“发刊词”

5、画刊创刊号独领风骚

- (1) 突出林彪及江青形象的画刊创刊号
- (2) 漫画类画刊创刊号
- (3) 画刊创刊号的发刊词

第八章 对外扩张势力的“异地版”

- 1、“异地版”不是“航空版”
- 2、“异地版”的分类
 - (1) 首都小报的省市版
 - (2) 省市小报的首都版
 - (3) 省市小报的外地版
 - (4) 专县版
 - (5) 航空版
 - (6) 串联版
- 3、因武斗等原因痛失家园的“异地版”
- 4、“异地版”的其它话题
- 5、最有影响和价值的几种“异地版”

第九章 显示力量的“联合版”

- 1、“联合版”是红卫兵的首创
- 2、“联合版”出现的背景和影响
- 3、“联合版”的发展与演变
- 4、“联合版”的分类和期号
 - (1) 直接署名“联合版”的小报
 - (2) 署名为“合刊”的“联合版”
 - (3) 署名为“联合专刊”或“专刊”的“联合版”
 - (4) 未署任何名称的“联合版”
 - (5) 由20家小报联合出刊的“联合版之最”

第十章 文革小报的“专刊”

- 1、“专刊”之“专”
- 2、“事件类”是“专刊”中的主流
- 3、以批判攻击为特色的“人物类”专刊
- 4、特殊专刊：毛泽东诞辰祝寿刊
- 5、其它各类“专刊”

第十一章 文革小报的“特刊”

- 1、“特刊”之“特”
- 2、非常时期的“特刊”
- 3、重大事件与“特刊”
- 4、“庆祝类”特刊

第十二章 文革小报的“增刊”

- 1、“增刊”作了炫耀天下的政治资本
- 2、矛头指向国家主席的两份“增刊”
- 3、歌颂类“增刊”独具特色
- 4、“增刊”的其它话题
 - (1) “异地版增刊”
 - (2) “联合版增刊”
 - (3) “动态类增刊”

(4) “事件类增刊”

(5) “批判类增刊”

(6) “讲话类增刊”

第十三章 各类“会刊”

1、带有强烈人身攻击色彩的批斗大会“会刊”

2、展示政治姿态的亮相型“会刊”

3、为武斗死难者高唱挽歌的“会刊”

4、庆贺类“会刊”

5、声援性质的誓师大会“会刊”

6、其它类型“会刊”

第十四章 “再版报”和“翻印报”

1、“再版”创刊号

2、各具特色的“再版报”

3、丛刊：被重新编辑出刊的“再版报”

4、难得一见的“翻印报”

第十五章 争取生存权的“复刊号”

1、走出“镇反”阴影的复刊号

2、因派性争斗打压停刊而再复刊的“复刊号”

3、因武斗停刊后再复刊的“复刊号”

4、其它原因停刊后再复刊的复刊号

5、一份特殊的“复刊号”：《湘江评论》第二期

第十六章 “停刊号”和“终刊号”

1、“停刊”非“终刊”

2、停刊理由各不相同

3、“终刊号”的分类

(1) “异地版”停刊形成的“终刊号”

(2) 因机构撤销而形成的“终刊号”

(3) 因“任务完成”、“结束”而终刊的“终刊号”

(4) 因报纸改刊或合刊造成的“终刊号”

- (5) 因“复课闹革命”而停刊的“终刊号”
- (6) 终刊原因不明的“终刊号”
- (7) “创刊号”即成“终刊号”

第十七 形形色色的“改刊号”

- 1、两份最值得关注和最有影响的“改刊号”
- 2、改刊原因种种
 - (1) 因争夺报名而改刊
 - (2) 因“形势需要”而改刊
 - (3) 因小报同名而改刊
 - (4) 从“油印版”改为“铅印版”的“改刊号”
 - (5) 因战斗团队更名而改刊
 - (6) 因报纸合并而改刊
 - (7) 原因不明的改刊
- 3、折射出派性冲突的“改刊号”
- 4、《红卫兵报》从“油印报”到“铅印报”再到《红旗飘飘》、《红旗风暴》的改刊

第十八章 文革小报的“画刊”

- 1、文革宣传画最早出现于小报版面
- 2、“画刊”的问世
- 3、“文革漫画”唱主角
- 4、专门画刊类小报登台亮相

第十九章 文革小报中的连环画

- 1、“文革”连环画起源于小报
- 2、《孙悟空四打白骨精》痛遭批判
- 3、漫画连环画遍地开花
- 4、画刊连环画异军突起
- 5、“文革惨案”连环画的一个标本

第二十章 文革小报引发的事件

- 1、《红卫战报》引发上海“《解放日报》事件”

- 2、《冲锋号》强印30万份引发的重大事件
- 3、清华《井冈山》参与“炮打康生事件”始末
- 4、《中学文革报》与“遇罗克事件”

第二十一章 特别值得收藏与关注的文革小报

- 1、刊有“群丑图”的《东方红》“终刊号”
- 2、与日本红卫兵合办的小报《惊雷》
- 3、开“天窗”的文革小报
- 4、期号相同版式内容却不同的两份清华《井冈山》第8期
- 5、绝无仅有的“地图战报”
- 6、各类“错报”

第二十二章 文革小报的报名和报头

- 1、以红卫兵造反团队性质取报名
- 2、以毛泽东诗词或语录命名
- 3、充满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报名
- 4、以“红”字开头的“红海洋”系列
- 5、以“新”字开头的“换新天”系列
- 6、以某个事件或纪念日作报名
- 7、以革命圣地作报名
- 8、以鲁迅或鲁迅诗词、著作命名
- 9、“文革小报”报头之流行趋势

第二十三章 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和轶事

- 1、究竟有多少种文革小报
- 2、文革小报最多的省市
- 3、文革小报是否有“号外”
- 4、文革小报编辑人员的构成
- 5、文革小报也发“记者证”
- 6、文革小报的征订与发行
- 7、文革小报是否使用过“繁体字”
- 8、编辑部出价向公众回收自己的报纸

9、“文革”当年北京、上海的小报交换地下市场

第二十四章 文革小报的衰落与消亡

- 1、1968年，小报渐成昨日黄花
- 2、中央从经济着手对小报进行限制
- 3、地方当局对小报的限制措施和打压
- 4、毛泽东痛批“五大领袖”与红卫兵运动终结
- 5、为小报唱挽歌的“工人报”
- 6、上海《工人造反报》终于停刊——文革小报最后的“绝唱”

第二十五章 文革小报之研究

- 1、“墙内开花墙外香”
- 2、西方学界对文革小报资料的利用
- 3、国内研究处于令人尴尬的“空白”状态
- 4、“文革小报”曾经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罪证之“证据”
- 5、观念正在转变
- 6、必须从头做起

第二十六章 文革小报的收藏及市场前景

- 1、小报在文革收藏品中的地位
- 2、10年升值“路线图”
- 3、画刊引领市场潮流
- 4、网上交易相对活跃
- 5、文革小报“精品”仍有很大升值空间

【博士论文】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三）

向 前

第一部分 史实与记忆：以湖南文革为中心（1966—1969）

第一章 从“造反”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5—1966.12）

任何历史事件的出现都离不开孕育它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复杂的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爆发深深根植于1966年以前的共和国历史。

第一节 文革的酝酿与发动

1 以阶级斗争为纲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主要矛盾转化、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中共八大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57年3月，毛泽东在天津党的干部会议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在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求搞这个建设。”¹这是党将工作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再次明确提出工作重心转移。

三个月以后，反右运动全面展开。期间，毛泽东写了许多指示和文章，对阶级斗争问题做出了过分严重的判断。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断然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

¹ 席宣，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简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6；《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957）》，185.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¹这段话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阶级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压倒了经济建设。此后，“大跃进”失败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经济调整恢复过程中，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将之视为对“三面红旗”的背叛，斥为“单干风”、“翻案风”，认为上层出现了修正主义。他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要求全党对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²

1962年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成为最高原则。学校开展“革命化运动”，一方面继续强化革命教育，另一方面对教育中非革命的内容进行否定和割裂，凡是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有关的东西全面受到批判。军队工作突出政治，奉行“四个第一”，³“红宝书”散发全军，号召军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迅速升温，红宝书风行全国，各地各行业掀起学毛著的热潮。

“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阶级路线”进一步主宰了政治的导向。毛泽东担心中国像苏联老大哥那样背弃革命走上歧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在他看来，赫鲁晓夫搞的是假共产主义，苏联的农业政策鼓励个体生产，苏联的教育制度培养的是当官做老爷的特权阶层，中国需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决不允许特权阶层在中国的出现，为保证革命政权永不变色，必须对文艺界、教育界进行彻底的改造，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一场革命，一场文化大革命。1964年，“文化革命”一词已经在广播和报纸中频频出现，并从文艺界、教育界发端。

之前，毛泽东先后对文艺工作发出了两个批示，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

¹ 席宣，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简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9.

²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年5月。见《文革文库》。

³ “四个第一”是林彪1960年提出的军队工作指导思想，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1963年9月。见《文革文库》。

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¹批示对整个文艺界作了基本否定的结论，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大批判不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及所属各协会进行，并且扩展到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批判迅速蔓延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²

毛泽东提出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本是对苏联国内情况变化的关注。后来，他把“阶级斗争”的重点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重点转向党内“修正主义”，强调防修反修的紧迫感。1965年1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确定了“阶级斗争”的新内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是防修反修的主要内容，也是日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号召。

2 “文化大革命”跃上头版头条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支持了姚文元的文章，批判运动持续扩大。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涉及到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而且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5月8日，《人民日报》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³社论文章以批判“三家村”为突破点，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强调阶级斗争，尤其重点强调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词以前只是出现在文艺副刊，这一次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这种变化表示“文化革命”不再仅限于文艺、教育和学术领域，它将扩展到一切领域，统摄全局，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全面系统地批判了由彭真主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认为“混进党里、

¹ 《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64年6月27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91.

² 卜伟华.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M].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4.

³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人民日报》，1966年5月9日。

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革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5月23日，会议做出决定，对“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定下基调展开批判，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宣传系统的陆定一等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

广播、报纸向社会大众宣传开展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呈现山雨欲来之势。各级地方政府都按照这一指示行动起来，紧跟中央步伐。北京抓出了一个“三家村”，按照“上挂下联”¹的做法，各地应该抓出“三家村”的爪牙。也许各地当政者并非出于本心，但形势所趋，必须抛出批判的对象，不然就会给人落下抵制运动的口实。²各地宣传系统的领导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首当其冲成为运动的牺牲品。³全国“文艺界修正主义头目”从中央到省会一级共有190多人榜上有名。1966年5月10日，长沙各报转载姚文元《评“三家村”》一文后，湖南掀起上挂下联在干部群众中大揪“小邓拓”的高潮。⁴湖南省文联主席周立波、作协湖南分会副主席康濯⁵等人首先成为湖南的“黑帮分子”。省会以下的更低层级地方，没有那么多名声显赫的“黑帮分子”和“修正主义头目”，一些平时爱好文艺，谈论文艺的人就被打为“小邓拓”、“三家村的黑爪牙”。⁶5月13日，中

¹ “上挂下联”是哲学上普遍联系的观点、政治上的路线斗争观点在阶级斗争和大批判中的具体应用，是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普遍适用的模式：中央有什么动向、典型以后，各级地方政府，甚至每个单位要找到与之对应的人和事，将二者联系起来，落实中央的精神对照起来批判。这种方法不始于文革，却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随心所欲的地步。

² 马识途回忆，在监狱中被一起关押的还有李井泉的妻子肖理。肖理曾经对他说“我知道他（指李井泉）做的有些事情，对不起你，希望你能谅解。那个时候他也是莫奈何，从北京宣布中宣部是阎王殿后，各地都抛出宣传部长来，他不得不把你和李亚群抛出来呀。”马识途，沧桑十年[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225。湖北省长张体学曾经说：“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王绍光. 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38.

³ 北京市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各界批判了《文艺报》主编张光年、作家丁玲、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全国美协党组副书记华君武等人。上海市被点名的有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作协副主席巴金、上海影协副主席赵丹、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等。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等人均在批判之列。中南地区，广东省受到批判的有中南局宣传部部长、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匡，广东省文联主席欧阳山，作协广州分会副主席秦牧。

⁴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 [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33.

⁵ 1966年4月28日，经过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湖南日报》第一次发表长文，公开点名批判著名作家、湖南省文联主席康濯，给他强加上莫须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康濯的名字一经见报，立即召来激烈的口诛笔伐。1979年1月，省委批准为康濯平反，恢复名誉。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76-777.

⁶ 陆芒. 老虎坪纪事. (未刊稿)：436.

共湖南省委指示湖南师范学院全校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随后，湖南大学、湖南财贸学院、中南矿冶学院及农学院、医学院以及全省各师专陆续停课。到5月底，全省被动员起来“围剿三家村”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已达到100多万人。

1

可是，即使是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批判也没有延续太久——没有人在与远不可及的敌人的斗争中得到或失去什么，起初唤起的那种激动也就很快在群众中淡化了。许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文化教育界的事，既然已经表示了道义上的支持，那么他们的使命也就算完成了。看来，没有新的刺激，这场运动很快就会陷入僵局。²

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指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把斗争目标转向“党内包庇资产阶级权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泽东批示将该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³新华社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配发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章说：“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盛赞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⁵

青年学生将学校内存在的问题和报纸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联系起来，他们效仿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响应革命号召。6月2日上午，湖南大学土木系道建62级“女生战斗小组”在校园内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十一个为什么》，质问校党委为什么按兵不动，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是不是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反对群众？⁶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又出现几张表示支持的大字报。下午，基础课部教师贴出题为《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对土木系“女生战斗小组”的大字报进行

¹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77.

² 王绍光. 理性与疯狂: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3: 30-31.

³ 《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的批语》, 1966年6月1日。见《文革文库》。

⁴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人民日报》, 1966年6月1日。

⁵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 1966年6月2日。

⁶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 [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433.

反驳，认为她们的大字报是对党委进行攻击。¹校党委当天下午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上，不少干部认为这是1957年大鸣大放和“右派分子进攻”的重演，应该进行反击。学校党委最终决定不用“反右派”这个提法，对于基础课部那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的观点，要态度明朗地支持，但对于像“土木系女生战斗组”那样的大字报，也不能采取压制的方式；要求各级领导都到基层单位去做工作，把群众的思想情绪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当天晚上，各系机关干部和政治课教师都下到学生宿舍去做学生的工作，一是宣传“延安不是西安，湖大不是北大”（《保卫校党委》大字报的主要观点）；二是劝说同学们不要把矛头指向领导，要他们吸取1957年一些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教训。经过这一番工作，许多人沉默了。²

第二节 工作队的进驻与撤离

1 反右模式的文革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发布了多项指示，要求“各校党组织不但要参加运动，而且要负起领导责任”。³随即工作组进驻学校指导运动。6月5日起，半个月时间里，北京市教育系统绝大部分单位都进驻了工作组。工作组按照当时在京的中央负责人所制定的“中央八条”开展工作，⁴要求“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

对待工作组，多数人表示欢迎，也有少数人反对。有的学校里，工作组进校以后宣布学校党委有问题，大家就拥护工作组反对校党委；有的学校工作组进校与校党委紧密合作，大家就拥护工作组和校党委。因为工作组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是权威的象征。少数学校的少数学生表现出反对工作组的态度，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工作组传达“中央八条”的指示后，学生中爆发出强烈的反对情绪，说“八条”是框框，是压制革命的大字报很快出现在校园里。反对工作组的行为

¹ 湖南大学校史编委会. 湖南大学校史[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586.

² 湖南大学校史编委会. 湖南大学校史[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586-587.

³ 《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1966年6月3日-7月28日。见《文革文库》。

⁴ 高皋，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M]. 天津：天津人民，1986：24

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反对工作组的意思，这种表态为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提供了信心和力量，他们认为反对工作组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¹因为工作组压制了群众运动。在北京，运动一开始就有不少的大字报直接针对工作组；而在省级地方，运动大多在学校党委和工作队的指挥下进行，针对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大字报很少。

湖南大学“女生战斗小组”6月2日贴出的大字报引起了长沙市委的极大关注。为控制运动局面，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向大专院校和其他单位派工作队的指示，决定抽调300至400名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全市各中等学校。²6月5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发表后，刚刚趋于平静的湖南大学校园再起波澜，大字报、大横幅和标语、漫画等铺天盖地，很快布满了办公楼和教学楼的走廊及内外墙面。到处都是“打倒党内走资派”、“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的标语。学校几位主要领导人都被指责为“镇压群众运动”，遭到“揭露”或“怒斥”；一些机关部门和教研室被视为“资产阶级保皇派”，受到了“警告”和“勒令”。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校党委频频向省、市委告急。³6月7日，省委以特急电报通知各地、州、市、县委：立即抽调工作队进入中等以上学校领导文化革命，各校一律“暂停两周”，“不够时还可延长”。⁴全省共派出工作队人员4600余人。⁵

6月9日，省委派工作队进驻湖南大学，宣布一定要相信省委、相信工作队。工作队在进校之前，省委有关负责人曾向他们介绍省会高校领导班子的情况，对在这次运动中要“批谁”、“保谁”交了底。湖南大学副校长、省文联副主席魏东明⁶于1959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2年经过甄别平反已重新安排工作。工作队组织了写作班子，要求尽快赶制出一两颗能再全省打响的“重磅炸弹”，开始对魏东明进行批判。继魏东明之后，历史学家、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¹ 王年一. 大动乱的年代[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35-36

²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 [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33

³ 湖南大学校史编委会. 湖南大学校史[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587.

⁴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78.

⁵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共产党志[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209.

⁶ 1966年8月27日，省委批准在《湖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在此之前，他已遭受两个多月的批斗折磨，身心备受摧残。1979年1月，省委宣布撤销关于长沙市委的上述决定和为魏东明平反恢复名誉。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82.

林增平也被省委点名批判。¹《湖南日报》于次日发表文章批判林增平，他和康濯、魏东明一道成为当时报纸大批判的主要目标。

6月底，运动在省内全面展开，仅据长沙、株洲、衡阳、湘潭、郴州各社教地区的社教工作团统计，揭发出来的“重点对象”已经超过3000人。文化大革命在三湘大地“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各单位已成为大字报的海洋。其中，又以文教系统各单位的斗争最为激烈。”²在各单位，工作队会同党委对揭发出的人和事进行“梳辫子”、“排队”，以集中火力开展斗争。被批判的一是报纸点名的“黑帮分子”和省委指定的批判对象，二是工作组圈定的运动对象。矛头指向所谓“黑帮”分子、文艺界名流、学术界权威和被定为“右派”的学生、工人、干部等，层层揪“小邓拓”、“三家村”，处处揪“反动学术、技术权威”。

6月27日至8月18日，工作队连续组织对魏东明的揭发批判。除了重翻“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外，着重批判他新近发表的《杜甫的为人》等四篇文章。在批判中，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例如，魏在文章中引用了杜甫的两句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被说成是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8月18日晚7时，在大操场召开2万多人的批判大会，从晚上8时到次日凌晨3时，对魏连续批斗了7个多小时之久。³据不完全统计，工作队驻湖南大学不到两月的时间里，各种会议和大字报点名批判了422人，其中由工作队定为“黑鬼”在校内进行监督劳动的有86人，包括担任系、部领导职务的“双肩挑”教师13人，一般教师64人，专职党政干部7人，其他2人。⁴

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主要有林增平、康濯等人。对林增平的批判主要是集中在其提倡的“历史主义”。文章说：“湖南史学界黑帮分子林增平，追随着他的祖师爷翦伯赞、吴晗，大肆鼓吹所谓‘历史主义’，‘不仅千方百计反对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研究历史，而且公开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污蔑和攻击。’⁵康濯被扣上许多大帽子——丁玲反党集团的‘文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牛鬼蛇神的保命恩人等，指责他‘别有用心，全面

¹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共产党志[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210.

² 湖南省委. 社教简报. 1966年6月.

³ 湖南大学校史编委会. 湖南大学校史[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587-588.

⁴ 湖南大学校史编委会. 湖南大学校史[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588.

⁵ 《“历史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一面黑旗——斥林增平利用史学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湖南日报》，1966年7月17日

攻击和歪曲农村形势；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攻击党的总路线；否定农民的革命性，而且诬蔑农民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¹《湖南日报》还点名批判了湖南师范师院中文系教师马积高、羊春秋。²马积高、羊春秋和林增平三人被称为湖南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8月27日，省委批准在《湖南日报》点名批判魏东明。此时，他已遭受两个多月的批斗折磨，身心备受摧残。³

文革初期，刘少奇曾指示要审查教职员队伍，处理地富反坏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⁴大批判浪潮中，出身不好的教师被抛到了风口浪尖。工作队圈定的斗争对象大多是家庭出身地主、富农，或者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和学生。他们从档案中查找线索，公布斗争对象的各种材料。响应号召的学生们积极行动，书写批判“牛鬼蛇神”的大字报贴满校园，甚至贴到批判对象的住房、办公桌上。不写大字报的学生就被认为对运动不积极，同情“牛鬼蛇神”。随着火力的升级，批判的范围越来越大，原来很受学生尊敬的老教师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有的学生甚至在听课笔记里找证据，把古文教学中引经据典的注释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把其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

长沙市一中是长沙最好的中学之一，也是干部子女最集中的地方，常常被视为中学运动情况的风向标。6月以后，一批活跃的学生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时政问题，其中有谢若冰、黄杏英、杨曦光等人。工作队进驻后，谢若冰、黄杏英等人认为工作队保学校党总支书记而将斗争矛头引向几位知识分子校长，连续贴出多张大字报，言辞激烈地指责工作队。长沙市一中教师叶卫东公开支持谢若冰等人造反的大字报。工作队和学校党委领导对谢若冰等人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谢若冰等人拒绝认错，被打成“反革命学生”。一道成为“反革命学生”的还有杨曦光，他们的罪名是参加了学生中的非法组织活动——工作队将学生的聚会视为非法组织活动。⁵杨曦光的父亲杨第甫曾公开反对“大跃进”，因此随着周小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⁶文革开始，杨第甫及其妻子被省委定为“反

¹ 《彻底粉碎康濯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湖南日报》，1966年7月4日

²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79.

³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82.

⁴ 《刘少奇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的指示》，1966年7月13日。见《文革文库》。

⁵ 杨小凯. 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

⁶ 杨第甫，湖南湘潭人。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1年10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被“整风”整了3年。建国初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1954年因“地方主义”受批

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斗争对象。驻长沙市一中的工作队向党团骨干披露了杨第甫的“反党材料”，杨曦光成为“反革命学生”可能与此也有关系。

6、7月间，杨曦光、谢若冰、黄杏英等人成为校内的重点批判对象。谢若冰等人听说毛主席反对派工作组，江青支持反工作组后，逃出长沙辗转上北京告状。大串联后，更多的人奔赴北京告状，寻求中央的支持。长沙市一中和师范学院等院校的学生成批到北京，促使高层领导关注长沙运动发展的情况。后来，这些运动初期被工作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人们全部投身造反运动，无一例外。其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了各种群众组织的核心成员，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学校之外，各单位也是在党组织和工作队的统一部署下开展运动。此时正是“四清”尚未结束，文革已经开始的当口，原已进驻单位的社教工作队直接转化为领导文革的工作队。长沙胜利摄影社的状况是文革在单位开展的缩影。

6月，社教工作队李队长召集了十多名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加上胜利摄影社的党支部成员和团支部成员，举行秘密会议。李队长要求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具体情况，挖出本地区单位存在的“三家村”，黑帮分子的小爪牙。第二天，大字报批判马上开始。这些大字报出自参加会议的政治积极分子之手，内容是单位党支部书记介绍的。重点批判的是三个人：地主家庭出身的甘可旺（虽然他是摄影社党支部委员），资方人员袁同坤，资本家的儿子瞿凯旋。被大字报顺带批判的还有两个青年职员，二人被工作队圈定的原因一是他们与瞿凯旋是师兄弟，平时关系密切，二是他们的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其他职工见状，为表示拥护支持文化大革命，纷纷贴出大字报表明态度。斗争一周后，李队长宣布甘可旺、袁同坤，瞿凯旋三人，就是隐藏在胜利摄影社的小“三家村”，并组织了一个由他和单位党支部书记挂帅的专案组，整理书面材料上报市委社教兼文革工作队总团，只待批示下来，就开除甘可旺的党籍，再给三人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降下工资级别，监督劳动。¹

工作队的做法使文革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惯例，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右加四清。7月3日，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

判降任省工业厅副厅长。1959年被列入以周小舟为首的“湖南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1963年甄别平反后任省农垦局局长。文革结束后，任省政协副主席。

¹ 陈益南. 青春无痕[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11.

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¹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²

2 工作组撤离和《十六条》

7月25日，毛泽东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批，二不会改”，起坏作用，是镇压群众，下令“统统驱逐之”，“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³29日，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市革命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⁴多位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表示了对文革的不理解，并对自己跟不上形势表示检讨。

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该大字报寥寥数语掀起了惊涛骇浪。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⁵

大字报把前面50多天称为“白色恐怖”，显示出毛泽东对前期运动的极度不

¹《彻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组在武汉大学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红卫兵三司《东方红》，1967年5月11日

²《彻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组在武汉大学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红卫兵三司《东方红》，1967年5月11日

³ 《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1966年7月。见《文革文库》。

⁴ 《刘少奇在北京市革命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见《文革文库》。

⁵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见《文革文库》。

满。文章印发全会，向全国传达。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其中最令人兴奋的语句是——“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十六条》说：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步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¹

8月4日，湖南省委决定撤消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工作队。²杨曦光对当时的情形有回忆：8月5日，工作组召集学生在军区大操场听刘少奇、周恩来和李雪峰的录音报告。全场四周贴着“同学们万岁！人民万岁！”的标语。听了录音报告，才知道派工作组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犯下的“错误”。工作队的人神色紧张却故作镇静，还特别走到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学生”的面前观言察色，并警告不要妄想翻案。“因此我虽然知道《十六条》中特别规定，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要允许学生自组政治组织，并要保护少数，但在省委工作组的威胁下，我不敢妄想翻案……”³

撤离工作队的动作十分迅速，不仅学校的工作队全部撤离，连派驻其他单位的工作队也一并撤走了。胜利摄影社的工作队撤离时，李队长宣布：甘可旺、袁同坤，瞿凯旋三人的问题，一律不再批判，也不作处理，甘可旺继续参加党支部工作，所整材料全部封存，待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再作结论。⁴前段运动产生的

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见《文革文库》。

²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80.

³ 杨小凯. 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

⁴ 陈益南. 青春无痕[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6: 11.

材料被暂时封存起来，不继续办理但也不宣布撤消，这为日后查抄“黑材料”和激化运动升级埋下了隐患。

文革初期，运动的每一步发展都与高层的指示具有密切关系。来自高层的指示使得领导和群众都有不理解、跟不上形势的感觉。各级党组织抓“右派分子”、“小邓拓”如火如荼的时候，高层的指示突然变调把工作队撤离了，这让很多干部非常困惑。遇到新问题的各级干部尽管不理解，但也必须紧跟，宣传《十六条》号召人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出台标志着文革的重大转折——工作组领导运动的结束，“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开始。长期以来，开展政治运动都是上级派出工作组领导下属各单位运动的模式，工作组由上级党组织派出，是党的化身和运动的领导机构。《十六条》破天荒地终结了这一传统模式，甚至打破了惯常的推理逻辑——“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就是反对党”，指出了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可以根据自己对《十六条》的理解参加运动。

第三节 “8·19事件”和“9·24报告”

6月初，北京就出现了党、团系统之外的学生组织，他们自称“红卫兵”。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盛赞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毛泽东写信支持的行为意味着给予对红卫兵组织的肯定，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8月18日起，毛泽东多次接见红卫兵，鼓励大串联，号召红卫兵将首都革命经验带到各个地方。红卫兵四处串联，到处点火炮轰，使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铺开。

1 长沙的“8·19事件”

大串联既起，全国各地大量学生也前往长沙串联。在高峰期，长沙市的红卫兵接待站平均每日接待外来学生达20万人。¹从各地来长的学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传单、小报、消息在长沙街头满天飞。红卫兵在街头演讲宣传，“只要不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我们统统都要打倒。”大串联的开展对鼓动群众情绪，动员群众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8月13日，长沙市第十二中学高25班胡宜民等5名学生，在市委大楼贴出

¹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 [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36

《坚决打倒“三相信”》大字报，还把“打倒三相信”¹的标语刷上了长沙市委大院围墙。²尽管工作队已经撤离，但党组织还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反对市委省委的口号无疑令人想起了“反革命”、“右派学生翻天”和“匈牙利事件”。这些标语使长沙城产生了极大震动，人们面对运动的形势似乎有些无所适从。

由于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在省委、市委授意下，以高级干部子弟为首，吸收“红五类”学生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建立起来。8月17日，长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简称“长保军”）正式成立，这是湖南最早成立的群众组织。郭立人回忆说，红五类子弟成立了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他们随意勒令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回到学校，强迫这些同学说出其家庭的剥削史，并恶狠狠地用皮带抽向这些朝夕相处、同窗共读的同学。³毫无疑问，“长保军”是绝对不同意“打倒三相信”的主张的。“长保军”成立的当日，主张“打倒三相信”的学生们在湖大办公楼前贴了张“紧急呼吁”的大字报，说长沙市运动冷冷清清，语录很少，要求湖大老大哥过河宣传送语录。⁴

8月18日，在北京告状的谢若冰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作为外地来京革命学生代表讲话。毛泽东还在谢若冰的笔记本上签名留念。消息传来，本已躁动不安的长沙市大、中学校学生再也按捺不住了。8月19日，湖南大学土木系200多人的队伍进入市委大院，就工作队问题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和辩论。他们将《十六条》写成大字报，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张贴在市委大院围墙内外。宣传车反复广播《十六条》，批判学校党支部执行血统论、压制革命学生，转移斗争大方向，指责省市委对由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采取抵制态度等。⁵长沙市委立即把各工厂的党、团员和政治积极分子召集起来到事发地点保卫市委，听从市委指挥的“长保军”也第一时间赶到。“保卫市委”的人数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他们一道把湖大学生包围起来。冲突中6名学生受伤，还扯烂了一些标语和横幅。这就是震动全省的“8·19事件”。

围绕如何看待“8·19事件”，人们产生了分歧。不少的群众对遭受暴力对待

¹ “三相信”指工作队宣布的“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

²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 [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434

³ 郭立人. “文革”校园杂忆[A]. 见: 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 长沙文史(第18辑) [M]. 长沙: (内部出版), 2005: 160

⁴ 湖南大学校史编委会. 湖南大学校史[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590

⁵ 丁克思. 我所经历的长沙“八一九”八中事件[A]. 见: 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 长沙文史(第17辑) [M]. 长沙: (内部出版), 2004: 27

的学生抱有同情，因为广播和报纸连篇累牍宣传红卫兵是革命小将。但是，这些学生反对省委、市委，提出“打倒三相信”，显然不符合多年来的政治生活经验。所以，有群众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学生”向党的猖狂进攻。

傍晚，通往市委的大街上出现了一支游行示威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工人组成，他们的横幅和标语上写着“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造反行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倒三相信”、“罢孔安民(长沙市委书记)的官”、“改组市委”等。同时，大批学生也走上街头，宣传“市委挑起工人斗学生”，呼吁各界支持学生。当晚，市委书记孔安民身着军装集合“工人赤卫队”讲话，号召工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反击右派学生，严防右派翻天。长沙市委发出指示，将“8·19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是右派学生对党的猖狂进攻，号召人们同右派学生斗争。

8月20日，省委华国锋、章伯森、李瑞山、万达、徐启文5位书记分头主持河东、河西两处数万人参加的“调查辩论”会。¹“长保军”借机展开对湖大学生的声讨，指责谢若冰等人欺骗党中央毛主席。大批宣传车四处游走，播报说“8·19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东风广场的数万人大会由辩论会变成对湖大学生的声讨会，引发部分大学生的强烈不满。湖大学生表示坚决反对，长沙铁道学院等单位学生愤而退出会场。他们继续发起游行，宣传“造反有理”和“市委挑起工人斗学生”。20日和21日两天，到处有工人、市民和学生进行辩论，学生时常遭到围攻，甚至被殴打，一时间气氛很紧张。²原本同情湖大学生的工人、市民等在压力面前也不再敢公开表达态度，只能选择沉默。

21日，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谢若冰、黄杏英在省体育馆召开会议，介绍北京的运动形势。原本由“长保军”控制的长沙中学生红卫兵开始出现分裂。22日，湖大学生继续上街游行，反对“长保军”的中学生对此表示支持。8月29日，胡宜民和谢若冰、黄杏英等牵头成立了“毛泽东主义长沙造反有理军”(后改为“毛泽东思想长沙造反有理军”)，这是长沙最早成立的与“长保军”对立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³

与“8·19事件”几乎同时，不少地级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衡阳地处湘南，距离长沙300多公里，交通方便，是京广线上的枢纽之一，

¹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81.

² 湖南大学校史编委会. 湖南大学校史[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591.

³ 叶长青, 陈益南. 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 (未刊稿)

北至长沙，南抵广州，西南达桂林。8月中旬，北京、桂林、广州、南昌、武汉、长沙、兰州等地24所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来衡阳串联衡阳矿冶学院学生造反。长沙“8·19事件”发生以后，全省轰动，成为第一大新闻。21日，衡阳矿冶学院学生到长沙串联了解情况。次日，熊反修、王红卫等人回校即成立了校内第一个红卫兵组织。8月23日，衡阳矿冶学院红卫兵在市内串联，得到十多个单位群众的支持，一道上街游行包围地委、市委机关造反。造反学生找地委代理书记石新山（书记胡云初因病长期休养）说衡阳地区的运动冷冷清清，责任在于地委领导不执行中央指示。上午，30多名学生到市委要求见市委书记杨兴洲。下午又来了200多人，堵住了机关大门，喊着口号占据了市委文革办公室和行政科的电话机。杨兴洲出来接见，被学生围住质问长达6、7个小时。当天，衡阳市八中800多师生乘火车前往长沙声援湖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为。24日，街头出现“拥护中共衡阳市委”的横幅和斥责学生胡闹的标语。有的矿院学生在街上遭受指责和围攻。群众中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观望。衡阳锁厂工人以郑开诚贴出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学生。政府机关部分干部组织成立了“东方红”、“红卫东”等战斗队。他们号召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连续贴出了四张《揭地委阶级斗争盖子》的大字报文章来呼应学生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市文教局部分工作人员到市委大院静坐示威，要求罢该局政治处主任陆维忠的官。市人委秘书处、经委、计委也有干部出来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计委27名干部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市广大革命群众起来大揭市委、市人委的阶级斗争盖子”。8月29日，曾在8月23日包围市委的学生成立了“红色造反军”。¹

2 “8·19事件”定性的转变

和学生相比，工人、农民则要显得保守得多。学生的造反行动不仅受到所谓“走资派”的抵抗，而且受到部分工人、农民的反对。他们难以理解学生的造反行为，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学生与工人、农民发生冲突的事件。这无疑是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反对。毛泽东认为必须立即扭转这一发展趋势。²8月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写道：

¹ 应山红. 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 (未刊稿)：40, 176—177, 74—75, 177—178, 106.

² 高皋, 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M]. 天津：天津人民，1986：95.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

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

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¹

具体到长沙，社论旗帜鲜明地支持“8·19事件”中针对省委、市委造反的学生，不仅说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组织，造反行动是革命行动，而且要求工农兵群众给予支持。社论一出，长沙市大中学校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部分干部和工人也离开工作岗位上街游行，声援学生。²

中央部分领导先后对“8·19事件”表态。陶铸指示秘书向中南局传达自己对“8·19事件”的看法，电话指示说：“长沙八月十九日事件，平化同志听取了去京请愿的湖大学生的报告，陶铸同志看了平化同志写的材料，认为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对学生运动实际上是法西斯式的镇压，如果不赶快改变，自己要垮台的。前几天延春同志给陶铸同志打电话，根本未反映真实情况。中南局要帮助省委迅速转过来，态度要坚决。”³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⁴和王任重、陶铸一

¹ 《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²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共产党志[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211.

³ 该指示是1966年8月24日发出的。《陶铸六六年六至九月给中南局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话指示》，1966年6月7日。见《文革文库》。

⁴ 1966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调张平化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免去其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王延春代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说陶铸是打垮“彭、罗、陆、杨”斗争的赢家之一。“那些死去和下台的领导人的职位必须要有人来接替。……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接替了彭真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务以及陆定一中央

道在北京接见了中南地区在京学生并发表讲话。张平化针对长沙“8·19事件”谈了三点：

“一、长沙有人提出的“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是错误的口号，利用这个口号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是反动行为。二、长沙有人阻止同学上北京，各种刁难，设下障碍，怕人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怕人告状的人是心里有鬼的人。如果没有鬼怕什么？没有鬼，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告状也好嘛！怕人家告状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三、长沙有人挑动工打学生，有的学生受到殴打。这种行为必须彻底追究，彻底查办。同学们要求中央调查，已向中央报告，一定调查清楚，中南局已经要求他们检查纠正。”¹

王任重说：“湖南问题，昨晚中南局讨论了。我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同志写了一封信，对指使殴打革命学生的负责人要严办！对站在楼上看同学被殴打的，一律撤职！”²

陶铸对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改组作了决定：“我今天打电话，长沙市委书记撤职了，站在楼上工人打学生，不下来制止，还笑，这些人统统撤职……王延春在几万人大会上检查……”³8月27日，陶铸再次指示中南局：“延春同志要彻底检讨一次，开大会，宣布改组市委的决定。这个检讨要印出来，广为散发。”⁴湖南省委作出决议，认为“8·19事件”中长沙市委副书记孔安民等人犯了严重错误，属于镇压学生，决定改组长沙市委，撤消长沙市委副书记孔安民、王群伍、韩曙光、市委秘书长张惠民一切职务。⁵

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华北局李雪峰取代彭真成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接替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陶、李、叶得到提升后，又对自己的亲信加以提拔或进行他们孜孜以求的调动。”该书认为张平化的擢升归功于陶铸上调后的提拔。“但是，最大的赢家却是在陈伯达和康生领导下，参加起草了《五一六通知》特别小组的重要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王力、穆欣。”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4-45.

¹ 《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1966年8月25日。见《文革文库》。

² 《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1966年8月25日。见《文革文库》。

³ 《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1966年8月25日。见《文革文库》。

⁴ 《陶铸六六年六至九月给中南局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话指示》，1966年6月7日。见《文革文库》。

⁵ 1966年8月31日，《湖南日报》刊出8月27日做出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改组原长沙市委的决定》。《决定》说：“八月十九日，原中共长沙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惠民同志同意调一

一系列的举措并未阻止事态的恶化。有人认为这是舍车保帅，于是接连召开“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要求改组省委，罢王延春、万达、章伯森的官。26日晚，游行群众在湖南宾馆围攻章伯森，冲击省委机关大院，省委多数负责人连夜躲离长沙。¹“8·19事件”令张平化极为不安，他刚刚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上调中央任宣传部副部长。可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长沙就闹出这么大的麻烦。经毛泽东同意，他准备回湖南担任第一书记。²8月30日，匆匆赶回长沙的张平化到湖南大学，在大会上他针对“8·19事件”发表了讲话。

首先，他重申了“8·19事件”的性质，说“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反革命性的事件。完全违反了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违反了十六条。挑动工人大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其目的就是要镇压革命运动。”³这个定性与《人民日报》23日的社论和几位中央领导25日接见中南地区学生的讲话精神一致，认定省委、市委“镇压”了学生革命行动。有了这个结论，冲击市委的湖大学生就不再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学生”，不仅无罪，反而有功。

其次，关于“三相信”这个口号，他说这样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什么‘反对省委、反对市委、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些说法是非常荒谬的。甚至有人反对党支部书记，也叫反党、反中央。党的领导是什么？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⁴这番话极具颠覆性，赢得了台下听众热烈的掌声。因为文革前的政治生活中，奉行的就是正是这个逻辑——“反对省委、反对市委、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甚至反对党支部书记个人也能够被定为“反党分子”。习惯的推理模式竟然被张平化指斥为荒谬，着实令不少人感到兴奋，觉得文化大革命确实跟以前不一样，形势真的变了。

再次，张平化就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这种派工作队的方法，是不信任群众，不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违反群众路线

部分赤卫队到市委机关维持秩序，以致引起湖大学生与赤卫队、红卫兵的冲突。原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孔安民、王群伍、韩曙光三同志对此事应负领导责任。鉴于这一严重错误，属于镇压学生运动的性质，省委决定并经中共中央中南局批准改组原中共长沙市委，撤消孔安民、王群伍、韩曙光、张惠民四同志的一切职务。”

¹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共产党志[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211.

² 1966年9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调张平化回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免除王延春代理第一书记职务。

³ 《张平化在湖南大学的讲话》，1966年8月30日。见《文革文库》。

⁴ 《张平化在湖南大学的讲话》，1966年8月30日。见《文革文库》。

的一条错误路线”，“听说师范学院就有不少的同学受到迫害，有的人遭迫害以至自己写了绝命书，准备自杀，这就是更严重的现象。这种事情，当然不是我亲手做的，事先我也不知道，最近在北京也是接见同学时才知道的。但是工作组是我派的，我不能不负责。”¹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出来就工作组问题检讨，为“8·19事件”重新定性，而且态度诚恳使现场听众异常惊讶和感动。

最后，张平化说自己回来有两个任务，一是请罪，二是造反。连省委第一书记都要“造反”，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张平化欣然佩带上红卫兵（自然不是“长保军”）赠送的“红卫兵”袖章，显示“要同湖南的革命师生员工、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站在一起造反，造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四旧’的反，搞好文化大革命。”²

如果说全文转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6月初的社论是文革的第一把火，撤离工作组和《十六条》出台是第二把火的话，那么“8·19事件”定性的彻底变化就是长沙文革的第三把火。有了张平化的表态，长沙造反形势一片大好。各大中学校学生连续举行游行示威，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学生、工人和群众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去河西大学校园慰问造反的学生，对他们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慰问、学习、取经活动持续了半个多月，人数最多时达到几万人。“学习湖大革命学生的造反精神，造一小撮走资派的反”的声音传遍全省。³9月1日，部分大中学校学生以及机关干部和工厂工人上街游行，召开“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提出“一改三罢”（即改组省委、罢王延春、万达、章伯森三人的官）口号。

与此同时，部分学生和群众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8·19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兴风作浪”，谁在这个事件中支持过湖大学生，谁就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这些学生、干部和工人提出拥护“三相信”口号并举行游行。⁴由于他们的口号和观点与报纸社论的精神相违背，也与张平化的讲话不合拍，因而得不到支持，暂时处于劣势。

按照中央领导的要求，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被迫做了公开的检讨。9月9日，长沙高等院校的学生和部分厂矿企业的工人在东风广场召开“全市革命大军炮轰

¹ 《张平化在湖南大学的讲话》，1966年8月30日。见《文革文库》。

² 《张平化在湖南大学的讲话》，1966年8月30日。见《文革文库》。

³ 湖南大学校史编委会. 湖南大学校史[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591.

⁴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82.

省、市委司令部大会”，会上提出了“炮打九级司令部”、“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¹张平化在接见大会代表时再次表示省委在“8·19”这个事情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²随后，中央正式发文调张平化回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免除王延春代理第一书记的职务。³

毛泽东批示指出“西安、青岛、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兵整学生”。⁴毛主席的批示当然是不容质疑的，以前反对学生的人们看到党中央毛主席是支持学生造反的，于是站到同情和支持学生的行列中。批判省委、市委成为政治正确的事情，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了。他们不仅支持造反学生，还顺带表达了对工作队和单位领导的不满。张平化明确说了“反对省委、反对市委、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的说法是荒谬的。⁵人们发现，原来领导的权威并非不可质疑。很快，批评领导的声浪日益高涨，单位领导却不敢像以前那样把表达不满的人打成“右派分子”了。

长沙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衡阳很快赶上了省会的运动步伐，从单位到街头的大字报集中火力揭地委、市委阶级斗争盖子，重点揭批以杨兴洲为首的市委在过去十七年中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文革中如何对抗《十六条》压制革命群众。市委被迫决定撤消了市直机关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因为有群众检举他压制 105 公司（与矿冶学院同属核工业系统）及供电所职工的革命行动。9月15日，杨兴洲前往衡南县礼堂参加大会作检查，因随行人员中有公安，引发群众抗议，会议中断。杨被群众扭送去长沙“交省委书记张平化处理”。17日，杨兴洲返回衡阳，带来了新的消息。⁶20 日，杨兴洲召开干部会，传达了张平化关于反击“右派”的指示精神，风向悄悄地转变了。

¹ 王年一. 大动乱的年代[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91.

² 《张平化对湖南“九·九”大会代表的讲话》，1966年9月9日。见《文革文库》。

³ 1966年9月11日，《湖南日报》刊出中共中央决定《调张平化同志回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并湖南省委：中央决定调张平化同志回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免除王延春同志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职务。现责成湖南省委认真接受群众批评，改正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深入群众，切实加强对该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和全省各项工作的领导。中央，1966年9月8日。”

⁴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1966年9月11日。见《文革文库》。

⁵ 《张平化在湖南大学的讲话》，1966年8月30日；《张平化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31日。见《文革文库》。

⁶ 应山红. 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 (未刊稿)：179.

3 “9·24 报告”和抓“黑鬼”运动

这一次戏剧性的变化与林彪的讲话有关。9月15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即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上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¹

尽管林彪的讲话中说了不许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不许挑动工农群众斗争革命学生，但省市领导更加看重镇压五类分子的含义。至于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中央鞭长莫及是管不过来的。因此，林彪讲话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各地党委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为旗号，对付敢于挑战权威的人。9月初，省委派华国锋赴京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华回省后误传中央有组织反击意向。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要坚守岗位，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要挺起腰杆，挑起担子，把各项工作做好。”

9月20日，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由湘潭电机厂介绍抓“黑鬼”经验。张平化、王延春在会上讲话，认为“8·19事件”已经由“坏事变成好事”，“牛鬼蛇神暴露出来了”，明确提出要进行反击。²24日，市、地委书记及省直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省委领导决定对所谓“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进行反击。³张平化发出抓右派的动员令，被称为“9·24报告”。讲话要求各级党组织反击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坏分子。一个月前在湖南大学和干部会议上诚恳的检讨、请罪和造反表态被描述成“阳谋”，是引蛇出洞的诱饵。他用1957年反右的经验和词汇说“前段是引蛇出洞，现在蛇已出洞，是打蛇的时候了”，“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许多党政干部原本就很不理解，受冲击后抵触情绪更大。省委提出反击，他们自然欢欣鼓舞，无需太多动员就行动起来。⁴各地就如何抓“右派”作了周密

¹ 《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15日。见《文革文库》。

²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共产党志[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212.

³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83-784.

⁴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共产党志[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212.

细致的安排，决定有多少右派抓多少，不受框框限制。“9·24 报告”以极高的效率全面执行——机关、厂矿、各商业单位展开了大规模抓“黑鬼”、“右派”的行动。一时之间，除了批判“右派”的大字报之外不见有其他大字报。运动前期所抓的“小邓拓”、“小三家村”再次惶惶不可终日，工作队撤离的时候，宣布他们的问题待运动后期再做结论，看来运动似乎已经到收尾的时候了。

由于《十六条》明文保护学生，所以抓“黑鬼”运动主要是在工人、干部及市民中进行，凡是同情、支持过造反的人统统都要审查。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人对湖大造反红卫兵表示过同情或支持，当初慰问湖大学生的人们一下全部都成了“黑鬼”和“右派”。成千上万的人们被揪出来，批斗、检讨是少不了的，有的被单位隔离审查、停职反省，甚至送进看守所。水电勘探设计院因写文章批评市委领导人的王建武、文化干部学校邓守宇等人，不堪忍受被打成“黑鬼”的事实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抓“黑鬼”运动是文革之初打击人数最多、波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事件。全省范围内抓出的“右派”、“黑鬼”数以十万计。¹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被卷进了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

衡阳锁厂支持过矿冶学院学生造反的工人郑开诚被作为典型批斗。衡阳市八中，原校党委在工作队撤离后一直还能够掌控校内局面。“8·23”造反后，校党委就已经整理好了造反活跃分子的材料送市文教局。9月20日开始，市委派来联络员驻校，专抓“右派”，按照谁支持炮打省、地、市委就抓谁的标准进行。联络员和校党委收集造反学生材料，指责活跃分子的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政治投机等等，在“红色造反军”中抓“右派”、“黑鬼”、“扒手”。“红色造反军”陷入重重包围，面临巨大的压力。曾经支持矿院学生造反的或要求“揭领导班子盖子”的积极分子，此时纷纷被迫做检查。²

《十六条》为造反的学生提供了保护。“9·24 报告”以后，造反的学生得以避免被抓“黑鬼”（地、县级有在学生中抓“黑鬼”的情况）。这些学生借助行动自由之便，不断向中央反映情况，把整理的调查材料和张平化“9·24 报告”录音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被打成“黑鬼”、“右派”的人们纷纷出走，既是避难也为了告状。他们得到大学生和一些铁路职工的帮助，前往北京寻求中央高层关注。长沙市一中教师叶卫东、衡阳锁厂工人郑开诚等和长沙、株洲、衡阳、郴州

¹ 叶长青，陈益南. 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 (未刊稿)

² 应山红. 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 (未刊稿)：76，79，180-181.

等地赴京人员一道，写信给中央控诉“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他们在北京散发传单，宣称“张平化是破坏湖南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要“打倒张平化，解放全湖南”。¹

在京告状的群众建立了组织。9月7日，“东方红总部”成立。10月14日，由叶卫东、张家政等人发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简称“湘江风雷”）成立。10月下旬，这些组织先后返回长沙，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四节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3日，《红旗》杂志社论再次批评了“压制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的现象，指出文革的对象是“走资派”，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²

社论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这一提法令前期受到打压的人们极度兴奋，它从思想上武装了造反派，给造反派以最有力的支持。³社论发表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运动的主线。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运动形势彻底扭转。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该指示。批文要求各地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宣读，坚决贯彻执行。《紧急指示》明确否定了各地抓“右派”的行为，说：

“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

¹ 应山红. 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 (未刊稿)：41.

²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红旗》，1966年10月3日。见《文革文库》。

³ 王年一. 大动乱的年代[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94.

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¹

《紧急指示》的批转是适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而做出的，也为挨整的人们进行平反提供了依据。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这次大规模平反运动，就不会有造反派在全国范围的涌现。²

10月6日，由“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大会，陈伯达、江青先后讲话，张春桥宣读了《紧急指示》。大会的高潮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为蒯大富平反。周总理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清华大学工作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致使蒯大富同志遭受到打击迫害，现在我们要为蒯大富同志彻底平反！”³周强调：“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所以不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说，而且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说。”⁴会上，蒯大富带领十万与会者宣誓：“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倒誓不罢休。”⁵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8·19事件”重新定性带来了转机。对运动形势估计错误的地方负责人不得不赶紧检讨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中央指示。显然，张平化意识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性错误。”10月5日，他到衡阳对地委代理书记石新山、杨兴洲等人说“9·24报告”有缺点。6日，北京召开万人誓师大会的同时，张平化在衡阳矿冶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对“9·24报告”做了检查。⁶10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湖南省委张平化、万达、章伯森与会。12日，张平化在北京以个人名义发表《郑重申明》，承认抓“黑鬼”是执行“资产

¹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1966年10月5日。见《文革文库》。

² 何蜀. 论造反派[A]. 见：宋永毅. 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M]. 香港：田园书屋，2006. 504.

³ 董国强. 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文革历史. (未刊稿) .

⁴ 《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6日。见《文革文库》。

⁵ 卜伟华.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M].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281.

⁶ 应山红. 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 (未刊稿)：181.

阶级反动路线”，¹宣布“9·24报告”内容作废，停止抓“右派”，给被斗的人恢复名誉，运动中形成的材料全部销毁。这份检查作为文件下发全省各级党委、人委和各单位，还被红卫兵印成传单四处张贴散发。

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张平化检讨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提出要给前段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干部群众彻底平反。²“9·24报告”内容宣布作废，被抓的“黑鬼”们得到了口头平反，造反派的声势日益浩大，对省委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11月8日，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迅速地作好平反工作的通知》，承认“省委在前段文化革命中由于不理解和‘怕’字当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以致一些单位和地方的干部、群众受到打击迫害，给文化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害”；为此，应该给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彻底平反”。³11月13日，长沙市各群众组织联合召开“批判湖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省委领导人在会上检讨。⁴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是毛泽东为了克服当时党内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各种阻力，继续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仓促提出的。⁵对被打成“黑鬼”和“右派”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脱离困境的机会。这些人自然不会靠拢以前的领导，按照“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逻辑，他们很自然地站在了反对省委、市委的一边。所谓“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逃过一劫的人们对拯救自己的党中央毛主席感激涕零。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坚定和政治正确，他们必须更加卖力地投入运动。声势大振的造反派成为运动的主角，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些群众构成了“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造反派的基本队伍，而保卫省委、市委的“工人赤卫队”、“红色政权保卫军”等成为保守派的代表。

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文化大革命在文教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开展，工厂、企业和农村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9月14日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¹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共产党志[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212-213.

²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共产党志[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213.

³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86.

⁴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86.

⁵ 卜伟华.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M]. 香港: 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08: 271.

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¹但经过抓“黑鬼”的动员，文革早已超出了原定范围，工人、市民和其他群众都已经被卷入运动。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正式改变了中央原定部署，“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²1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简称《农业十条》)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³还规定农村要“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⁴文化大革命迅速扩大到全国工交企业、财贸部门和广大农村。

2 高涨的造反浪潮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后，因为出身和反对工作组而受到打击、压制的人们中普遍感到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参加革命了。大批群众也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获得了发泄的机会。对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和特殊化现象不满的群众，将这次运动当成是反对官僚主义；对工作待遇不满的群众，以为这场运动的到来是改善自身待遇的时机；在“反右派”、“反右倾”、“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中挨过整的一些人，也以为这场运动的到来有助于纠正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因而造反要求翻案。“文化大革命”前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地以畸形的状态表现出来。⁵过去长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歧视而累积起来的怨气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场运动与改变自己的境遇和命运联系起来。他们需要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决心，要毫不妥协地向“走资派”开火。造反风潮如暴风骤雨一般顷刻间席卷了

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1966年9月14日。见《文革文库》。

²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1966年12月9日。见《文革文库》。

³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6年12月15日。见《文革文库》。

⁴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6年12月15日。见《文革文库》。

⁵ 卜伟华.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A]. 见：郭德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三)[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116—117.

三湘大地。

在大中学校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主要是批判工作队及其支持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因出身问题而受歧视、压制的学生得到“解放”，纷纷成立或加入组织。后起的红卫兵组织突破了只有“红五类”才能参加红卫兵的限制，他们的造反精神比压制他们的红卫兵更强，在批判和冲击各级领导机关时更无所顾忌。¹8月29日，谢若冰和胡宜民、黄杏英等牵头成立了“毛泽东主义长沙造反有理军”（后改为“毛泽东思想长沙造反有理军”），这是长沙最早与“长保军”对立的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组织。²省委随即将谢若冰的父母打成“黑帮”，“长保军”借机大肆渲染，揪斗批判。谢若冰作为“黑帮”子女面临压力，先退出“造反有理军”，随后在南下学生朱大年、印东兵³等人协助下，和黄杏英等于10月28日成立了“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井冈山红卫兵”）。长沙中学生两大阵营——保守派（“长保军”）和造反派（“造反有理军”及“井冈山红卫兵”）正式形成。

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先在北京成立，后回到省内活动。9月7日，“东方红总部”在北京成立，10月30日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公开成立大会。10月14日，“湘江风雷”在北京成立。10月底，68名“湘江风雷”成员回长沙造反。11月2日，“湘江风雷”在省委礼堂第一次公开举行批斗张平化大会。13日，长沙市各群众组织又联合召开“批判湖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强烈要求“平反”和交出“黑材料”。张平化在这些大会上被迫检讨。⁴

前期被批斗的普通群众得知中央的平反指示，但却迟迟等不到单位正式的平反，便纷纷参加“湘江风雷”等组织寻求帮助。他们还在各自单位建立造反派组织的基层组织，把具有相同遭遇的人聚集起来，向本单位的领导索要“黑材料”。各级党委和工作队抓“小邓拓”、“右派”、“黑鬼”的行为全部被归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前不敢乱说乱动的人们成批加入进来，为解除头上的紧箍咒，他们不惜放手一搏，为索要“黑材料”与单位领导翻脸。衡阳矿冶学院学生李瑞林

¹ 卜伟华.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A]. 见：郭德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三)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76

² 叶长青，陈益南. 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 (未刊稿)

³ 此二人为北京市三中学生。

⁴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85.

等20多人成立考察团从衡阳到长沙，经郑开诚¹介绍结识了叶卫东，参加了“湘江风雷”。回衡阳以后，李瑞林等组建了“衡阳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设立司令部发展组织成员。²他们提出的平反诉求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8·19事件”中造反的湖大学生于10月15日建立了“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8·19事件”发生时，“高司”组织尚未正式成立，但这批大学生却是当之无愧的造反先锋。“9·24报告”以后，这些学生协助工人、市民向中央反映情况争取平反；他们还帮助工人、农民组建了自己的组织。国营湘潭电机厂党委宣传部部长兰云飞在抓“黑鬼”时成为当时省内的第一号大右派，遭到拘押。“高司”成员全力活动为兰云飞翻案。兰云飞得到平反后，带领以他为首的湘潭工人组织“革造联”加入造反派，成为“高司”的支持者。³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过去都是党政领导干部掌控局面，现在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面对造反派群众的批判浪潮，各级领导猝不及防。“长保军”等保守派组织反对把斗争矛头对准各级党政领导，认为这些干部可以批评帮助而不应该全部打倒。他们贴出为省委辩解的大字报，指责“湘江风雷”、“高司”等是“反革命”，是“右派翻天”。召开大会批斗干部时，“长保军”时常冲击会场，与造反派经常发生冲突。为尽力维持秩序，10月19日，省委散发《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强革命团结和更好地支持革命调查的建议》传单，呼吁：一、革命的同志应加强团结，“集中力量，继续揭发批判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群众中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应通过正常的充分的辩论”，“取得一致”；二、机关干部和工农群众，应加强和学生的团结，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但不要去参加学生中不同意见的争辩；三、恳切要求今后不再提保卫省委的任何口号，也不要写为省委辩解的传单和大字报；四、各校师生代表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到各地各单位进行“革命调查”。然而，省委的上述呼吁除第三条外均得不到实现。⁴

¹ 郑开诚系衡阳锁厂工人，与叶卫东一起在北京告状。

² 应山红. 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 (未刊稿)：41.

³ 叶长青，陈益南. 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 (未刊稿)

⁴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84.

3 查抄“黑材料”

10月12日，张平化正式宣布“9·24报告”内容作废，停止抓“右派”，给被斗的人恢复名誉，运动中形成的材料全部销毁。这份检查作为文件下发也被印成传单到处张贴。但是，各单位干部对销毁专案材料和平反、恢复名誉态度很勉强。有的干脆像工作队撤离时一样，不恢复名誉不宣布平反不销毁材料，只是停止批判，静观其变。或许，在他们看来，目前仍然是在“引蛇出洞”，前段时间的斗争大概是时间搞早了一点而已，斗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¹运动形势的变化无常使工人和市民谨小慎微，大中学生和造反派的骨干成员们担当起先锋的角色。“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等造反组织在长沙也设立了联络站，他们和长沙的造反派组织人员一起到工厂、机关、学校宣传，把北京的最新动态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抛开顾虑，投身查抄“黑材料”、要求平反的活动。造反派群众除了索要“黑材料”，还经常包围党政机关要求追究相关领导人责任。衡阳党政机关和其他单位前段时间受批判被下放劳动的人回城，以他们为主的各种战斗队纷纷成立，批斗抓“右派”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追查抓“黑鬼”的负责人，并冲击档案室或到相关人员的办公室和家里搜查“黑材料”。

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来说，“黑材料”是“指文化革命以来工作组搞的材料档案，而不是包括文化革命以前的人事档案，干部档案”，但是“文化革命以来整理保存的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不能交出来。”²但到具体操作层面就出现了无数的纠纷：第一，哪些材料是“黑材料”，没有人具有甄别的最终决定权；第二，单位领导无法证明应该交出的材料已经全部交出，既然证明不了，群众就容易怀疑还有材料没有交出；第三，“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他们的材料”一语中的“别人”所指为何，是否包括对立面的群众？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人们就只能各行其是。

党委和领导人对此并不积极，不愿意交出材料，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是1966年5月16日以后搜集的材料，其中一些有价值的将来也会有用。再者，积极分子们也不希望材料流落出去，因为其中许多是他们的“告密”作品。更重要的是，干部和积极分子们不相信这些过去一贯被认为工作不积极、思想不上进的造反派

¹ 陈益南. 青春无痕[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37.

² 《周恩来关于个人档案材料处理的意见》，1966年10月25日。见《文革文库》。

会永远得势。¹所以，虽然中央明令材料应当众销毁，许多单位的领导或政工人事部门的干部并不执行，甚至复制转移材料以备日后再用。围绕材料如何处理、哪些人应给予平反等问题，上下级之间和群众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造反派群众有的派出代表要求与干部谈判协商，有的发起请愿、绝食、包围占领办公场所，也有为抢夺材料而发生肉搏战。

干部和积极分子采取了各种各样“藏”的办法。藏的地点，通常是本单位的机要部门、保卫部门，也有转移到公、检、法、军队等其他单位。这些行为一旦被人得知，往往激起更大的愤怒。群众查抄活动不断升级，常常出现冲进档案室、办公室翻箱倒柜搜查的情况。有的单位造反人数太少，为壮声势就邀请单位外力量的支持，索要不到就砸门锁、抽屉、文件柜、保险箱自行搜查。11月8日，湘江风雷、首都三司联络站等群众组织成员，强行进入市委大楼，抄走大量文书档案材料。11日，湘江风雷40余人进入长沙纺织厂搜查所谓黑材料，与该厂对立派职工发生冲突，互有损伤。²14日、15日，省委机关遭到群众组织大规模冲击，办公楼各办公室、档案室均被搜查封闭。经反复交涉，10余日后，才逐步启封恢复工作。这一次冲击在全省引起连锁反映，许多地、市委机关以及单位机关的办公室被封被砸。³

郴州市一中一批学生串联到广州，看到中大红旗派集中销毁“黑材料”大为震撼，担心自己有“黑材料”。他们赶回学校要求领导交出材料当众销毁，与奉命保护材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发生了冲突。双方在保存材料的办公楼大打出手，抢夺材料的过程中，部分档案散落在地。有学生拾起来发现居然是部分“红色政权保卫军”成员的“黑材料”，其中一个还是负责保卫材料的头头。原来，他是某公社的农民子弟，因为有过“农村过苦日子时饿死很多人”，“学校食堂是不是在揩油”等言论被人检举。学校把这些检举材料留存下来，却万万没有料到这时候竟然被抖落出来。该“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负责人看到自己的“黑材料”后大惊失色，保卫校党委的信念在一瞬间崩塌。他临阵倒戈，带领众人把藏匿材料的办公室全部查抄，将档案材料当众销毁。看到一袋袋的“黑材料”被销毁，他们感觉到自己头顶的重压随着腾空的火苗一下被释放了，身上的包袱能够被永

¹ 王绍光. 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83.

²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 [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38.

³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大事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86.

远抛弃。“虽然看不清楚未来等着我们的是什么，但眼前的三倍的兴奋——能做个人的兴奋，能当一个革命者的兴奋，既能摆脱些什么、又能期待些什么的兴奋，就足以使当年十八岁的我们，投身于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风险了……”¹

尽管省委不断呼吁，要各派群众团结，“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两大派群众组织在查抄“黑材料”和批斗省委市委干部的过程中矛盾不断升级。11月中下旬，造反派的盟友“首都三司”的联络站被“长保军”多次砸抄，工作人员遭到围攻。²12月3日，“湘江风雷”等封闭《湖南日报》，遭到“八一兵团”等群众组织反对，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斗。17日，“湖南红旗军”等冲击了《长沙晚报》报社，导致报纸停刊。³“长保军”与“青年近卫军”在长沙砖厂一带发生大规模武斗，致使多人受伤，直到军队出面制止才平息下去。⁴29至31日，“高司”等与“长保军”在省委大院内，展开了拳脚武斗。结果，“长保军”大败，落于下风。

¹ 伍仁. 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57.

² 卜伟华.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A]. 见：郭德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三)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105.

³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 [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38.

⁴ 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 长沙市志(第2卷) [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39.

【评论】

关于高万春之死及其他¹

范世涛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王友琴女士长期追踪研究文革受难者，并将调查和记录文革受难者放在了文革史书写的中心位置。她的研究直截了当地呈现了文革历史的残酷性，给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本文作者从王友琴女士的多篇论著中得到教益。但是，我也注意到，她关于高万春校长在1966年的“红八月”恐怖高潮中自杀去世情况的描述并不准确，有必要根据更可靠的资料加以订正补充。除了致力于这一任务，本文还将简要讨论由此引起的“红八月再研究”和“口述访谈陷阱”问题。

(一) 王友琴关于高万春之死的描述

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王友琴女士这样描述原北京市立第26中学（今北京汇文中学，以下简称“26中”）校长高万春的遇难情况：

高万春，男，北京第26中学校长。1966年8月连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残酷殴打和折磨后，在8月25日的“斗争会”后自杀身亡。当时40多岁。

1966年6月文革开始的时候，由上面派“工作组”到了学校中领导“运动”。第26中学被划为“四类学校”，即最坏的一类。高万春遭到“揭发”和“批判”。

1966年7月底，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下令撤走“工作组”。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控制学校。在第26中学，组织了一个有46名教职工校园“劳改队”。在“劳改队”中的人，不但被逼写所谓“交代材料”及在红卫兵看管下扫厕所运垃圾，而且被挂黑牌、“游街”。“劳改”和“斗争”之

¹ 感谢卜伟华、何蜀、吴迪老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的不当之处由本文作者负责。

后，只给他们吃一个窝窝头，喝一碗凉水。

1966年8月25日，在“斗争会”开始前，该校红卫兵（他们也是“首都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的成员）已经在一间教室中把46名“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打了一个多小时。随后，手持棍棒的红卫兵站满教学楼门口两边，“劳改队”中的人一被带出来，就遭到乱棍暴打。有人眼镜被打碎，两眼流血看不见路。有人被棍棒上的钉子扎破，鲜血直流。

到了会场，46人全部被迫头挨着地跪下。高万春校长被五花大绑押到会场。他被强迫跪在一条上面铺有碎尖石头的长凳上，多次被乱棒打下来，又从地上被揪上去。

在“斗争会”后，高万春跳楼自杀身亡。

一名当时的学生说，在高万春死亡以前，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把一个名叫“苏素”（名字的声音如此）的男人拉到校园里打死了。听说这个人是个文人，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少校，住在学校附近。当时有一个高三的学生看到打人，觉得不舒服，别的红卫兵说他“没有阶级感情”，让这个学生也过去打了几下。这个人被打死后，红卫兵学生叫高万春来摸死尸，并且对他说：“你和他的下场一样。”

在这一时期，这个学校还有一位老教师跳楼自杀。在午饭时间，学生正在去食堂吃午饭，看到他从楼上坠下。他摔断了腿，幸好没有死。

曾经把第26中学划为“四类学校”并领导学生“揭批”高万春的“工作组”是共青团中央派来的。组长名叫李淑铮，是一位女士。“工作组”被毛泽东撤销以后，他们也受到红卫兵的攻击。李淑铮曾经被揪回第26中学“检讨”“认罪”，遭到野蛮对待。她喝剧毒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因为及时送到医院，幸而没有死亡。¹

在1995年初次发表、2006年增补的著名论文《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²，以及2010年发表的《恐怖的“红八月”》中，关于此事的描述完全相同，与早些时候的版本相比更为简练，但内容有重要补充：

¹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2004；此处引文根据该书PDF版，第140-141页。

² 王友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号。1997年后，该文英文本被著名文革史专家、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印入中国文革史课程读本。不过，这篇文章还没有关于高万春之死的内容，2006年的增补本才加入了这一案例。

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¹

在2010年的一次访问中，王友琴明确提出，“北京第26中学校长高万春受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也在8月26日自杀。”²以上是王友琴关于高万春自杀事件报告的大致情况。

（二）8月25日追悼会系赤卫军而非红卫兵组织

1966年8月25日晚，26中高万春校长在校内的会议上遭受了侮辱和殴打。王友琴女士将主要责任归于该校红卫兵，其实，主持当晚会议的是26中工人组织“赤卫军”。

这样说的根据，来自我收集的两册26中高三某班同学的日记（以下简称《普通日记》）³。日记作者为学生党员、团支部书记，出身店员家庭，参加过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但到9月初为止，并未参加本校“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红卫兵（东方红）”等红卫兵组织。《普通日记》8月25日条记录了高万春当晚被打的情况：

晚上开追悼李春长同志大会。李春长同志出身贫农，他是被高万春、丁连信、冯大同等黑帮逼死的。他们迫害他染重病，一直对他百般刁难，使心脏病益加严重，最后死去了。

¹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补版）》，<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947>。

² 高伐林《专访王友琴（上）：宋彬彬是否参与打死校长》，2010年，http://zonehaiguinetcom/chairwolf/zone_digestphp?id=28668。

³ 日记作者的姓名暂不披露。

会上，李春长的哥哥、李春长的爱人控诉 26 中黑帮的罪行。会场上不断爆发出愤怒的呼声：“打倒高万春！”“为死难的阶级弟兄报仇！”当把黑帮押上来的时候，群众拥上前去，狠力打去，那伙黑帮拼命逃窜。

这次大会是由赤卫军（我校工人组织）组织的。¹

可见，8月25日殴打高万春等“黑帮分子”是作为“追悼李春长同志大会”的一个环节来安排的。李生前为该校工人，因心脏病去世。李的家人和该校工人组织“赤卫军”将其归咎于高万春、丁连信、冯大同等人。所以追悼会上家人控诉“黑帮的罪行”后，会场出现了高呼“打倒高万春！”、“为死难的阶级弟兄报仇！”的群情激愤场面；在这种氛围下，“黑帮”被押上来，也就出现“群众”“狠力”打“那伙黑帮”，“黑帮拼命逃窜”的场面。在这次会上参与殴打高万春等人的“群众”，可能有“红卫兵”，但肯定不限于“红卫兵”。特别是，这则日记清楚地表明，主导这次追悼会的并不是“红卫兵”，而是该校工人组织“赤卫军”。

（三）8月25日 26中“黑帮”不到20人

王友琴称8月25日被斗的是46名关在“劳改队”的“牛鬼蛇神”，而上节提供的日记引文非常明确，当晚被斗的是“黑帮”。而当时26中的“黑帮分子”不到20人。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牛鬼蛇神”和“黑帮”两个词涵盖的范围和指向的侧重是有所不同的，前者范围比后者大得多——“牛鬼蛇神”形形色色，“黑帮分子”只是其中一种。

早在1966年5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已经成为国内多种报刊的流行语²，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更是以此为题，要求“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

¹ 《普通日记》手稿8月25日条，本文作者收集。下文对该日记的引用不另作注。

²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275-276页。

爷’打得落花流水”¹。由于这篇社论重点指向“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文革初期“牛鬼蛇神”一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化部门格外流行。不过，“牛鬼蛇神”一词流行时间很长，而且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含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其中既包括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包括“历史反革命”或其他可疑分子。

“黑帮”一词从“三家村黑帮”演化出来。最初主要在基层单位的大小字报揭批“三家村”时使用²，公开的报刊文章使用较少。转折点发生于1966年6月1日晚8点30分，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5月25日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从此，这张大字报中使用的“黑帮”一词开始在官方媒体流行³。次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这一大字报，并配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沿用了“黑帮”一词，开篇即称，“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称“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号召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⁴。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以“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为题，矛头指向了“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号召“放手发动群众，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统统打倒，把他们盘踞的一切阵地统统夺回来”⁵。

¹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² 如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一位高三女生在1966年5月27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所在班里声讨“三家村黑店”大会的情形：“大家义愤填膺。句句质问，阵阵口号，却表达不尽对敌人对邓黑帮的恨，表达不尽对党对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爱。”参见范世涛《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载《记忆》第82期，2012年3月31日。

³ 这张大字报两次使用“黑帮”一词：“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

⁴ 本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

⁵ 《人民日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1966年6月16日。

这个词在全国风行三月有余¹，但到 1966 年 9 月 10 日，周恩来在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黑帮这两个字不能乱用，我们四、五月份用过黑帮黑线²。十六条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没这样提，这些名称不确切，这样就没边了，容易错打人。不能说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说绝大多数也不符合事实。多数还是好的。今后不用黑线黑帮这个说法了。”³相对“牛鬼蛇神”，“黑帮”一词流传时间较短；也因为流传时间短，“黑帮”一词在使用过程中的泛化程度比较低，矛头指向相当明确和集中，主要指“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的领导，简单地说主要是各个单位的领导。

在 1966 年 8 月，26 中“黑帮分子”有多少人呢？

这主要看该单位的领导班子情况。6 月 2 日，26 中书记许群在解释为什么大字报只贴校内不贴校外时，说过“我们十几个人又能给他们进行什么支援？首都活动有深远影响，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有秩序的活动。”⁴所谓“我们十几个人”，指的是学校领导层一共有十几个人。这也正是该校“黑帮”的大概数字。

8 月 11 日，26 中关押“反党黑帮”的劳改队成立，14 位校领导班子成员作为“黑帮分子”进入劳改队。据《普通日记》当日记载：

夜里我值班，从 8:30—2:30。从七点钟开始，斗争高万春。群众激愤，呼声震天，反党黑帮，无不惊慑。斗争以后，令黑帮十四人劳动，至很晚。

在随后的日记中，《普通日记》又记录了两位“黑帮分子”被“揪出来”关进劳改队。所以，如果没有漏记的话，截至 8 月 25 日，该校劳改队合计 16 位“黑帮分子”；8 月 25 日晚的追悼会上被斗争的也应是这 16 位“黑帮分子”。

不过，我们还要考虑日记作者漏记的情况。鉴于日记的作者积极参与文化大

¹ 如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 年 7 月 8 日）提到“我跟黑帮们的区别”（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 72 页）；8 月 25 日中共中央转发的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报告提出，学生和群众不要到军队机关揪、斗黑帮分子（参洪承泽、郭秀芝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沿革大事记（1949-1978）》，春秋出版社，1987 年，第 314 页）。

² 1966 年 3 月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多次使用“黑线”的提法，因而四、五月份的报刊杂志大量使用这一词汇。不过，6 月 2 日以前使用“黑帮”一词的情况非常少见。

³ 《周恩来同志九月十日在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七一战斗队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都传单大字报传抄（一）》1966 年 12 月，铅印本，38 页。

⁴ 《普通日记》手稿 6 月 7 日条，本文作者收集。

革命，对学校发生的大事记录比较细致¹，而且“黑帮”的数量受到该校领导班子成员数字的限制，即使有漏记，遗漏也不会太多。所以，无论如何主要关押“黑帮分子”的26中劳改队不会达到46名的规模。考虑日记作者漏记情况后的合理估计，是26中8月25日有不到20名“黑帮分子”关在劳改队²。

本文初稿提出这一判断后，得到26中初二某班同学、红卫兵成员卜荣华回忆的证实，“（26中）劳改队的人员也就一二十人，没有46人那么多。”³

这个估计数与北京四中的情况比较接近。据曾任四中劳改队看守的刘东回忆，该校劳改队人数多时达到二十多位，原四中劳改队成员没有对这一数字提出异议⁴。

那么，劳改队46名之说来自何处呢？在“北京汇文中学官方网”上我找到同样的数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成了重灾区。党支部被工作组定为“四类支部”，先后有46名教员被送进了“劳改队”，教师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和迫害，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⁵

该文成于2011年8月，有可能采自王友琴的文章；但也有可能该校早前版本的校史中已有此说，被王友琴援引。

如果该校确实曾有46名教员被送进“劳改队”，按照人数推测，应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候的事，而不会是1966年的事。因为26中前身为教会学校，如果把所谓“历史反革命”算上，“劳改队”才可能达到46人。

（四）高万春自杀距8月25日被打有三天之隔

¹ 下文的引用会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² 既然该校领导层不到20人，“黑帮分子”主要是单位的领导，因此，关押“黑帮分子”的劳改队不会超过20人。

³ 本文初稿完成后，我请卜伟华老师协助寻找了解26中文革初期情况的知情人。卜老师于2012年3月31日回复电子邮件，告知卜荣华原为26中红卫兵成员，正文引用的为卜荣华原话。

⁴ 刘东《我亲历的四中文革》载《记忆》2010年6月30日总52期；王行国《商榷与补正》载《记忆》2011年6月30日总72期。

⁵ 北京汇文中学校史编辑委员会《北京汇文中学校史概述》，2011年8月，见北京汇文中学官方网 <http://www.pka.edu.cn/n3/n18/c735/content.html>。

王友琴将高万春自杀与8月25日批斗被殴直接联系起来，并将高的自杀时间定为8月26日。实际上，高于8月28日晚饭后自杀，距8月25日“追悼李春长同志大会”上被打有三天之隔。

《普通日记》8月28日条记载如下：

下午晚饭后，高万春跳楼自杀了。

事情是这样的：高万春在三楼扫地，他要上厕所。一个纠察队员跟着他去了。高万春进了厕所，纠察队员在外边等着。等了半天怎么也不见他出来，于是纠察队员进去看了看——没有人了。纠察队员到下边一看，只见高万春躺在地上，他跳楼了。

于是赶快叫来医生，同学们都闻讯赶来。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也走在里面。据医生说，高万春脑震荡很厉害，血压是0，打了三针强心针。高万春晃晃悠悠。后来，把他搁上汽车，拉到医院去了。

高万春跳楼自杀，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它反映出这个革命委员的严重错误。高万春对人民有罪，给他办一个罪名，或者给他一颗子弹这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关键在于，高万春是个大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仅仅开始，许多问题还没有揭发，一斗、二批、三改尚未着手去做。这是最主要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就达到了斗倒批臭资产阶级当权派、教育群众的作用。现在，他自杀了，无疑将会对完成这一个任务带来最大最大的困难。

据医生说，他这个病，即使要看好，也要二三个月。

8月29日的日记开头写道：

早上听说，昨晚高万春尚未到第四医院就断气了。今早他老婆领着个孩子在操场哭哭啼啼的。

当然，那三针强心针白打了。

这则日记中提到某位文化革命筹委会委员（他称为“革命委员会委员”）负有责任，但没有详记。这位委员与“赤卫军”3天前追悼会上的打人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并不清楚。

（五）其他订正和补充

除以上方面，王友琴关于高万春的叙述中还有若干细节需要补正：

1、关于“苏素”（？）之死

王友琴谈到“一名当时的学生说，在高万春死亡以前，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把一个名叫‘苏素’（名字的声音如此）的男人拉到校园里打死了。听说这个人是个文人，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少校，住在学校附近。”

作为现场目击证人，《普通日记》作者当天对8月24日该校“红卫兵”打死事件有详细记载：

早晨，二楼教室围打一个红卫兵捕获的流氓。这个流氓在昨晚乘居民斗地主、资本家的机会，企图强奸一个女学生。女学生愤怒之极，扇了他一个耳光。结果被“红卫兵”发现，当场捉获，剪去背头，押进我校。十二点钟进校，关进高三（4）教室，两人看守。文化革命委员会李连林给他一张纸，一支笔，要他老实交代。他胡写乱画。至5点钟，仍无所坦白。一部分初中的学生把他押到初二教室，手持皮带、木板狠打。我醒时恰闻嘈杂之声，赶下楼来，前去看望。只见他的背上黑血淋漓，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就象烂茄子一样。但他仍不老实，拒绝交代。于是将他押下二楼。下楼时，朝暖气管狠力撞去，一下不成二下，别人拉住。看去头上已撞破，血涌如注。到操场时，继续狠力。他大声痛哭，那知哭声越高，鞭声越响。这时他知道耍赖不行了，于是说了一些总头目坐山雕，底下分四个队（铁链子队、棒子队、红衫队、丰收队），又有四大太保……

我没有再看下去，只觉得血腥臭味，一阵恶心，于是离开而去。

所谓“听说这个人是个文人，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少校，住在学校附近”，显系道听途说之辞；而道听途说的源头，就是受害人被毒打之后，“说了一些总头目坐山雕，底下分四个队，又有四大太保”。不难想象，受害人死后，部分当事人为掩饰打人致死故意传播了完全不可信的谣言。

对于动手情节，上引日记也写得比较清楚，“一部分初中的学生”先在初二教室“手持皮带、木板狠打”，后带受害人到操场“继续狠力”，受害人大声痛哭，结果“哭声越高，鞭声越响”。

2、关于26中红卫兵

王友琴说，撤走工作组以后，“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控制学校”；26中红卫兵是“首都红卫兵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成员。

26中红卫兵并不是工作组撤走以后成立的，它成立的时间在6月上旬或中旬。6月8日，26中的一些学生和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300多人相约来到清华附中，声援与学校领导形成对抗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几天后这些学校陆续成立了各自的红卫兵组织¹。

而且，26中位于北京市崇文区，该校红卫兵不可能是“首都红卫兵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成员。所谓26中红卫兵是“首都红卫兵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成员的说法显系王友琴的臆想之辞。

3、关于李淑铮和工作组的关系

王说，“曾经把第26中学划为‘四类学校’并领导学生‘揭批’高万春的‘工作组’是共青团中央派来的。组长名叫李淑铮”。

当时，团中央组成了以胡克实为团长、惠庶昌为副团长的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总团，下面各区成立分团。李淑铮是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崇文分团的团长。

(六) 余论

上文对王友琴女士关于高万春之死的报告提出了若干订正和补充，虽然没有涵盖她报告的所有细节，但动摇了她力图建立的两个主要联系：一是8月25日批斗会与26中红卫兵的直接联系；二是8月25日高万春被打与8月28日黄昏自杀事件之间的直接联系。这可能会进一步损害读者对王友琴关于高万春之死其他描述的信心。

从这里出发，我想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一是关于“红八月”的再研究问题。

王友琴的《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是一篇开拓性的重要论文。此后，她沿着该文确立的基调，反复强调1966年8月“红色恐怖”与红卫兵运动的紧密关系。她认为，1966年夏天，教师们随时被骂被打“通常”“只有‘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被允许参加在学校中打教师及在学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为。

¹ 卜伟华2012年3月31日给范世涛的电子邮件；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载《记忆》第10期，2008年12月28日。

在当时，参与打人被认为是一种光荣或者特权。”¹但高万春8月25日被打的情况表明，参与暴力行为的未必“通常”“只有‘红卫兵’组织的成员”。

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反例。如王友琴曾谈及北师大女附中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非常正常死亡的例子，称“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²而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最近公开了几份当年的调查材料，其中一份是1966年12月8日王晶尧与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的谈话。在8月5日这一天，胡与卞书记曾一起被打。她告诉王晶尧：“高一3班××领着一批学生监督我们去刷、洗、搬运厕所的厚盖板”，“边搬边打”，后来“×即把胡交给一批初一初二的学生监督。临走时间：你们谁是红五类？大家都不回答。只有一个学生勉强说她是。后来，胡边劳动，她们边打。”³也就是说，参与1966年8月5日暴力殴打教师的，除了北师大女附中部分高一年级学生，还有相当一批并非“红五类”的初中学生。

既然王友琴女士在她重点考察的高万春之死和卞仲耘之死案例上都出现了重要失误，其它描述是否也可能存在类似问题呢？或许，我们有必要更细致地探究“红八月”的“红色恐怖”是怎样具体发生的，红卫兵和非红卫兵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或许不象王女士所设想的那样简单。

二是关于口述访谈陷阱问题。

文革受难者这样的研究题目性质严重。在文革档案尚未开放的情况下，王友琴女士采取了以口述访谈为主的研究方法，并主要依据口述资料提供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和细节，为保护群体记忆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从关于高万春和卞仲耘遇难情况的报告看，王友琴女士对口述访谈资料的运用并不严格，结果都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怎样通过访谈获得可靠资料和线索，避免落入“口述访谈陷阱”，值得关注和进一步讨论。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访问者的自我约束。由于文革开始距今已40多年，访谈对象对

¹ 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补版）》，<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947>。

² 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38.html>。

³ 王晶尧整理《胡志涛谈话补记》（1966年12月9日），载《记忆》总第82期，第97-99页。

时间、地点、人物、过程都可能记不清楚了。访问者既要唤起访谈对象的回忆，也要尊重这种记忆模糊性，避免以个人想象强加于访问对象。

就高万春的案例看，王友琴女士的访问对象显然并不记得高万春到底死于哪一天。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引用过的王氏2004年、2006年著作对此含糊而过，只说“在‘斗争会’后，高万春跳楼自杀身亡”或“‘斗争’之后‘自杀’”，并没指出具体什么时间“自杀”；而2010年的访谈中，却进一步明确提出，高万春“在8月26日自杀”。这种补充很可能是王根据自己的想象作出的判断。还比如，王并不清楚26中红卫兵的成立时间，但说8月25日前后“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控制学校”，这也是访问者对访问对象记忆的不恰当补充。

第二，关于访问对象约束。有的访问对象并非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对事件的了解来自未必可靠的传闻；有的访问对象即使了解事情的一部分，也不一定了解事件的全貌。在访问过程中，访问对象有时会根据个人想象、不完整的记忆进行推测，补充并不真正了解的环节；即使大体了解的情况，访谈对象也可能会不必要地添油加醋或各种原因加以修饰。

所以，访谈者需要识别甚至提醒访问对象在当年的具体身份和位置，并强化访问对象的责任意识。比如，访问结束后，将访谈记录交给本人审阅修改和同意；尽量争取他或她同意在论文中注明访问时间和受访人；如果她或他不同意披露自己的姓名，也应在脚注或尾注中尽可能地解释资料来源，比如交代访谈对象当时的身份和访问时间。王友琴女士在利用访谈资料时，均未注明出处、访问时间和访问人，结果使部分不可靠的访谈资料渗透到论文正文。8月25日高万春被批斗应由该校红卫兵负主要责任，恐怕就是这种情况。

第三，关于口述资料的交叉核验。单个个人很容易忘记或记错什么事，但这可以通过增加访问对象来提醒和交叉核对；同时需要尽量利用大字报、小报、传单、揭发交代、日记、回忆录等书面资料来校验补充口述访谈资料。

王友琴女士借助口述访谈，在论文中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细节，这让人惊讶和钦佩；但另一方面，我也常常对她的论文居然使用如此之少的书面文献感到非常不安。

2012年3月25日拟稿

3月31日

【读书】

让史实现身，以真相示人

——读余汝信新著《香港，一九六七》

印红标

1967年英国统治的香港发生猛烈的政治风暴，对香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事件由工潮升级为左派群众与港英当局的激烈政治对抗，乃至暴力冲突。事态的发展，以左派逐渐丧失社会同情，不得不实行退却和港英当局的得手而告终。事件的背景是伴随香港经济起飞而尖锐化的社会矛盾，战后国际反殖民主义浪潮的激荡，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极左政策的冲击。而最后一点是香港左派一改迂回政策，正面出击，最终招致重挫的主要原因。

1967年的香港政治风暴与1926年的省港罢工、1989年的民众声援和抗议活动，是20世纪震动整个香港社会的三次政治运动，均为内地政治所波及，与中共政策相纠葛。而后二者的政治敏感性更不待言。

香港和内地舆论对1967年风暴褒贬不一，从事件之中“反英抗暴”与“暴乱”的两极对立，到后来香港左派阵营的反思与右派的坚持，中共的高调支持到避而不谈，不一而足。评论自可见仁见智，但是历史事实却是不可更改的，并且是评论的基础。最近十来年，香港和内地一些学者开始探讨这段历史，且陆续披露了一些资料。余汝信先生的新著《香港：1967》（以下简称《香港》）是以历史资料见长，全面梳理历史事实的一部力作。

余汝信出生并受教育于广州，1980年之后迄今往来于内地与港澳之间，于文革历史有深入研究，尤其以史料研究的严谨与细致入微，在同仁中受到尊重。这样的学术背景，为其研究文革影响下的1967年香港风暴提供了扎实的根基。

一. 以史料见长，让史实说话

《香港》一书最重要的特点和贡献是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重现历史过程。由于40余年风雨的冲刷，1967年的历史事实不仅在内地，并且在香港也渐渐变得模糊。实际上，很多内幕在当年就鲜为人知，更有因政治忌讳或有意无意

的编造，或因袭传闻的演义。因此，历史学者首要的任务是厘清事实的来龙去脉。

《香港》对于1967年历史的再现，一如作者在前言所说：“力图以史实本身去说话，不做主观描述，在展现材料时少加评论甚至不加评论，而将笔者个人对事件的整体评论放在最后的结余部分”（第10页）作者把更多的思考留给了读者。

按照这样的主旨，《香港》的核心部分以月为顺序进行记事，几乎是逐日引述历史资料。对于事态的公开进展，主要引述左派喉舌《大公报》和持相反立场的《明报》的报道，常常是交替呈现立场对立的《大公报》与《明报》的大段报道乃至全文。对于内地的发展，则引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文稿。分析与判断则交由读者自己进行，例如：对工潮引发骚动的叙述（第108—120页）。阅读此书，令人感觉如同置身当年，翻阅几家报纸，从对比之中找寻真相及背后推手。

同样，对于北京学生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轰动国际外交界，而内地报道回避或者语焉不详的事件，则尽可能详尽地大段引述各方报道和回忆，包括：清华大学四一四派学生负责人的回忆、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对亲历者的访谈、《人民日报》刊发的新华社电讯、法新社、美联社、合众社的报道，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处编印的《快报》报道、周恩来等领导人严厉批评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学校造反派的讲话。相关材料即便不说是一网打尽，也是荟萃空前。

香港左派的行动通常是遵循中共中央的精神，甚至是直接的指令，这是公开的秘密。《香港》在尽量汇集既有资料的同时，披露了一些外界鲜闻的资料，并注明出处，从而为探究中共中央、广东省党政当局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及决策，为澄清种种传闻，提供了权威依据。

在资料方面，在外交部工作的冉隆勃、马继森曾经撰文著书谈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披露了一些内部信息。《香港》重视这些资料并引述了新的资料。例如：廖承志关于香港问题的给周恩来的信、吴荻舟的几篇回忆、还有新华社北京总社电告广东分社转香港分社（小新华社）关于报道的指示。

读者从《香港》的注释亦可以得知，早先署名“叶曙明”发表的网络文章《支援香港反英抗暴斗争》，是当年中央及广东省党政领导对香港运动几则指示的汇编，是非同寻常的权威资料。

《香港》对于香港和内地各派人物，尤其是左派及中共党政人物的履历、任职的了解甚为详尽，并见诸注释，令读者一目了然。另外著者对于当年涉港机构、

其成员及演变，也了然于胸，从而令此书的讲述具有独到的资料价值。

二. 尊重事实，不为尊者讳

讲到 1967 年香港风暴，不可不涉及中央的决策，不可回避周恩来的作用。《香港》根据历史资料赞同这样的判断：周恩来领导了“反英抗暴”的全过程。

内地的著述对于 1967 年香港风潮很少提及，通常是将失败的责任归结为受“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也有香港人士的回忆文章称，香港的极左作法，是受到听命于江青、中央文革小组的外交部造反派的影响，与周恩来没有关系。

然而，《香港》引述的多方面资料说明，周恩来始终是香港“反应抗暴”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中央的主要决策是经周恩来主持制定，或者批准的，包括：批准廖承志 5 月 12 日提出的“香港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的初步意见”，为应对香港事态在北京组成港澳工作新机构，多次强调在斗争中要掌握的政策界限，修改和批准人民日报 6 月 3 日社论，8 月 19 日批准外交部次日向英国提交 48 小时限时照会，以及严厉批评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等，而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香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插足亦很少见。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中央并无马上收回香港的打算，其目标仅是依靠民众的力量，压迫港英当局退让，在香港扩展中国政府和左派的影响力，复制 1966 年澳门左派“12·3”运动。但是，英国不是葡萄牙，港英政府强势弹压，香港左派则受全球范围左翼运动高涨，尤其是文革极左思潮的激励，不知适可而止，而是针锋相对，直至暴力对抗。这是总体谋划的失误，而非讲究政策之类局部问题。

可以看出，周恩来在领导香港的反应抗暴斗争中，十分注重政策和策略，在内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不能照搬国内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办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左倾潮流中又表现动摇，常常处于被动应对状态，没有根本扭转运动的总方向，致使香港左派的行动走向极端。例如：周恩来审阅《人民日报》6 月 3 日社论清样，察觉原定标题“行动起来，粉碎港英的反动统治”不妥，马上与陈伯达交涉修改。题目改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但是内容修改很不到位，社论中的一些话，诸如号召“随时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仍然给人以中央可能尽快收回香港的

印象。实际上，中央高层确有采取军事行动的考虑，六三社论发表没几天，毛泽东发话：“现在不打”，但社论的影响已经难于收回。

又如，周恩来指示不搞总同盟罢工，但是批准定期罢工，并要求斗争能够长期地、破浪式地前进，准备斗到年底，或年初取得胜利。后来香港左派还是发动了20个工会的“联合大罢工，周恩来也表态支持“反帝抗暴大罢工”。

外交部对英国发出48小时限时照会是一个重要的失策，也是经周恩来批准的。北京红卫兵正是在照会到期之时冲动地采取行动，冲进英国代办处，随后火烧。周恩来事后也批评了发布48小时限时照会的作法。

《香港》为准确认识周恩来在这一次事件中的作用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资料，并且表现了正面历史事实，不为尊者讳的精神。

三. 香港左派的历史命运

《香港》对当年香港历史真相的探究，提出了文革极左造成严重危害的案例，也引人思考左派的命运。

当年，香港左派维护劳工权益，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斗争具有正义性，却误判了形势，采取激烈对抗的过激方式，走向极端，结果是事与愿违，造成了历史性的重挫，多年之后仍然难以挽回。有理而不知有节，失去了香港社会的人心，教训深刻。反观港英当局，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暴力镇压，直至平息骚动，更重要的是于事件过后采取多种措施调整政策，缓和社会矛盾，赢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舆论，反被动为主动。

这一切与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共对港政策紧密相关。新中国鉴于冷战背景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遏制，出于外交和经贸的考虑，制定了维持香港澳门现状的政策，继而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就是说，在香港澳门维持殖民主义统治的现状不变。英国的殖民主义体系在二战后土崩瓦解，到1960年代，在亚洲只剩下弹丸之地的香港。实际上，中国收回香港易如反掌，而英国之所以统治香港到1997年，关键不在于英国的蛮横，而在于中国政府不想即时收回（为了“利用”），否则港英统治至多拖到1960年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香港的政策就不能如在内地一样，去根除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而是向殖民主义妥协。有人戏称毛泽东时代在内地是“宁左勿右”，在香港是“宁右勿左”，十分传神。于是，香港左派的理念与行动就发生了矛盾：在理念上反对资本压迫，反对殖民主义压迫，这两种压迫在二战后20年间的香港是社会的现实，而非左派的“煽动”。但是，另一方面，左派又不能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亦不能驱逐罪恶的殖民主义出香港，而要维持香港稳定，以利新中国对港政策的大局。

内地文化大革命极左激情燃烧，令香港左派跃跃欲试，中央的判断与指挥失策给左派发出错误的信号，左派以为终于等来了“这是最后的斗争”（国际歌）的时刻。左派群情激昂，爱国青年勇敢出击，大字报贴到总督府，冒着催泪弹上街游行，拼出家人的生计带头罢工罢市，直到置放真假土炸弹开展城市武装斗争，意在威慑港英政府却误伤无辜民众，徒然授人以柄。临了，中共无意收回香港，鸣金收兵，下令退却。香港左派却陷入尴尬，被港英当局镇压、逮捕、坐监不说，还被自己人指为“极左”思潮，两头不是人。此景不免令人感叹香港左派难当，亦钦佩其马前卒般的勇敢与服从大局的忠诚。

在香港，过激是行不通的。不说港英的体制，光是逃离内地中共统治的三百万政治及经济难民，就是影响社会舆论的不可忽视的社会构成。这与内地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并不相同，甚至1997年回复行使主权之后，香港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也不可能像半个世纪之前解放军进城之后的北平、南京、上海地下党一样，来个浮出水面的公开大会师，忙不迭地去接收权力。“一国两制”要求香港左派必须在法治、民主的构架下，通过不懈的真诚服务争取市民的选票，而不能依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朝权在手，便要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经此历练，香港左派是否可以在大中华区域升华为一个尊重法治、民主、自由的，在多元思想和政治条件下稳定发展的新的爱国爱港派？

《香港》以资料见长，让史料和史实说话而著者少做描述，这令研究者细读起来饶有兴味，但是对于仅仅希望了解当年那场风暴始末的普通读者，或许会感到陷入纷繁的历史资料，而难于把握事态的脉络。此外，《香港》对于1997年事件讲到8月，对左派的退场过程一带而过，不免让人感到不够完整。尽管如此，《香港》无疑是研究1967年香港政治风暴不可不读的重要学术著作，给读者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依据和思考空间。

【读书】

周恩来领导香港“六七事件”

——评余汝信新书《香港，一九六七》

陈竞新、江雁南

1967年香港亲北京力量“反英抗暴”，遭港英当局镇压。余汝信根据广东军管会及国务院资料，发现周恩来是主导者，中共一度有意派解放军进驻香港。

香港传统左派1967年发动席卷全城的连串骚动事件，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成为香港政治发展的分水岭。事件却存在对立的诠释与评价，香港社会普遍称之为“六七暴动”，甚至称为“香港的文化大革命”，左派人士却指事件源于英国殖民政权对工人的高压政策，称之为“反英抗暴”。资深文革研究者余汝信，却以中立的态度，称之为“六七事件”。他耗用多年时间，透过在港和大陆包括大量当时北京主管机关和广州执行机关负责官员亲身经历的一手材料，撰写成《香港，一九六七》一书，还原事件的时序和真相，澄清过去一些香港作者的误区。

余汝信1950年在广州出生，亲历红卫兵运动。在互联网发表多篇文革研究文章，编着《红卫兵兴亡录》、《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等书。他向亚洲周刊说：“‘六七事件’不是自己产生的，与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有着十分密切、难以切割的因果关系，是文化大革命向境外的延伸。研究事件真相，需要大陆和香港两方面资料互补。”有指当年身为港澳工委常委的新华社社长梁威林和副社长祁烽受文革影响表现得左一点，将事件源头指为香港本地，余说这完全是错误解读。余澄清过去有指“六七事件”由文革小组主导的说法。“文革的左的路线，是毛泽东决定的，是全党的错误路线，并不是中央文革几个人决定的，周恩来跟着毛泽东走，外事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文革的手根本伸不到香港。但周恩来曾经在指导香港问题上受到极左的影响。是否体认了他在文革特定环境下的一种无奈？那就需要继续研究。”

余汝信中学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参加过红卫兵，对文革有亲身体会。八十年代到香港，由于长期从事文革的研究，对香港六七年发生的事件产生了好奇。他认为，香港大多数对“六七事件”的研究在资料搜集方面局限于香港和英政府

方面，“忽略了大陆对香港左派的影响力，或描述内地情况时极大的偏离了史实。”素以史料研究见长的余汝信，在进行文献研究时，除新华社发布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社论及外交方面的动态性报道外，详读 1967 年香港左、中、右的报章，整理各方报道，还取得时任广东省军管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提供的“反英抗暴”材料，以及原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负责人吴荻舟家属收藏当时吴个人的原始材料等，使《香港，一九六七》一书对还原历史起到重要作用。

香港“六七事件”由该年五月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引起，之后不断升级，从左派工人的罢工罢市，到放置真假炸弹以至开展小型城市游击战阶段，及至港英当局七月起四出扫荡及捉人，八月勒令《香港夜报》、《新午报》及《田丰日报》三份左报停刊。之后北京外交部发出 48 小时限时照会，要求港英当局撤销停刊令，无罪释放五十多名记者和工作人员等，引发 8 月 22 日晚北京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期间并有两名幼童在北角清华街被铁罐型炸弹炸死，之后香港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驾车途中被人截停并向内投掷汽油弹烧至重伤死亡，更成为香港的重要历史记忆。

余汝信在书中引述上述的原始资料，证明周恩来在事件中的主导角色，而毛泽东和周也完全掌控包括中共一度有意派解放军进驻香港的过程。书中结语其中一节“周恩来领导了反英抗暴全过程”以日程表列出，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廖承志 5 月 12 日向周恩来提交了《关于香港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的初步意见》。15 日起连续三天三夜在英国代办处门前举行的由北京市革委会组织的百万人示威等游行集会，都是外交部建议，周恩来批准的。6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的社论，提出要香港左派“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也是经周恩来修改后批准发表的。令人狐疑的是，这篇社论发表才过了几天，周恩来的指示便开始缓和下来，据余在书中引述，周恩来电告广州军区，要谈一谈收复香港的问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当即率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乘专机赴京，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主任李维英等随行。周 6 月 7 日单独接见温玉成传达了毛泽东有关香港问题的四点评论，毛并拍板：“现在不打。”余汝信向《亚洲周刊》说：“香港在 1966 年有天星小轮事件，中方的表态是不支持这批人搞社运的，当时《文汇报》也有

评论，要保持社会稳定，这却和只不过半年后文革中支援工运的口径完全相反，为什么如此截然相反？另外，五十年代初，刘少奇是第二把手，对香港工人运动，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到了文革就不同了，反英抗暴违背了中央一贯的‘长期打算’的原则。”他还谈到，香港当时打工仔有一百四十万左右，但能动员的工人只有六万，只有百分之四，显示左派动员力量并不是那么大，当时《文汇报》、《大公报》等左报发行十多万份，事件后大幅下跌。左派之后放土炸弹等过激行为，香港人叫“菠萝”（凤梨），引起香港普罗大众反感。

对于今年适值“六七事件”四十五周年，有当年参与事件人士积极办研讨会，策划推出历史纪录片及书籍，期望社会能重新看待这段历史。余引述前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后对事件的定性说：“群众是英勇的，路线是错误的。”他赞成个人和路线应该分开来看待，群众是无辜的，不应该为错误路线负责，而（港人）更不应该对于当年参与事件的人，投以另类眼光看待。不过他提出忠告，“六七事件”给予的教训就是，中共的香港政策，任何时候的重点，都应该是防左，避免再像“六七事件”时，违反了一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

《香港，一九六七》在书首特别引述了二十世纪初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 George Santayana 一句最著名的话：“那些不能铭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余说，这句话是六七事件的最好总结和注脚。

【序与跋】

《香港，一九六七》序言

余汝信

本书的缘起，出自一位资深出版家的提议。

香港本身，是一本难以读得懂的书。笔者旅居此间已近四分之一世纪，未敢说读懂了其中百分之一二。笔者更深知对1967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做一公正描述之不易，更遑论做出评价！十个香港人，或许就有十种认识，而这些认识往往又是相互对立抵牾，不可调和。正如有人称之为“反英抗暴”，有人称之为“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左派骚乱”，更有人称之为“港式文化大革命”，等等，不一而足。唯笔者乐意接受这一可能失败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毕竟是那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多少对这一段历史有着一定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本着对历史学的偏爱，亦有意试图做一次基础性的史实重建工作，借此机会，以还原其本来面目，澄清或更正一些对此段历史的误传误读。

未可否认，香港和内地的不少学者，以往已曾对这段历史作过一定深度的探讨，亦有了不少成果。唯由于对史实缺乏认真的查证，内地学者通常会犯对这段历史描述部分失实的错误。

如上世纪末作为汕头大学人文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之一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一书，称1967年8月港英政府“又查封了《文汇报》、《大公报》等3家报纸。中国方面也采取强硬的反措施，7月以间谍罪名软禁了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格雷（Anthony Grey）。”¹我们知道，1967年8月港英政府查封的是《香港夜报》、《丰日报》和《新午报》三家外围左报。7月限制格雷行动自由，是对港英政府判处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入狱两年等举动的报复性措施，并没有使用“间谍罪名”。而且，限制格雷自由一事在前，查封三报事件在后，前者如何能成为后者的“反措施”？

又如，2006年出版、作为世界知识出版社“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之一的《百年中英关系》，重复了《20世纪的中英关系》的错误，称“中国方面则以间谍罪软禁了路透社驻京记者格雷”，“8月，港英当局采取进一步措施，查封了

¹ 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页378。

《文汇报》、《大公报》等3家报纸。”¹

再如，内地有出版物称，“8月20日后，斗争升级为中英两国间的外交斗争。中国外交部愤怒谴责港英当局，要求英国政府在72小时内撤消对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8月23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指挥下，北京红卫兵和干部群众一万多人，同时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并火烧了代办处，酿成了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²以上这段话，有三处史实错误：一、外交部当时提出的期限是48小时，不是72小时；二、发生火烧英代办处的时间为8月22日晚，不是23日；三、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动与外交部造反派并无关系。

香港本地的出版物，则往往由于对内地的情况了解有限，或忽略了内地政策对香港左派的影响力，或描述内地情况时极大地偏离了史实。

如霍英东在其回忆录中称，“当时，主政中国军务的林彪，已经下令派出两个师的兵力进驻香港，当部队进入沙头角，准备进入香港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紧急要求撤兵。”³这是将当时中共最高层的关系与决策过程严重演化了。切莫忘记，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还是毛泽东，林彪只是副主席。如此规模的军队调动尤其涉外军事行动，毛泽东是牢牢紧抓在手不放的，当时，绝不可能有未经毛允许林彪私调兵力进驻香港的事情发生。

即便是当时港澳工委的某些负责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有不少并非实事求是的套话。如《香港六七暴动内情》的作者张家伟在访问前港澳工委常委、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梁上苑时，梁称，“中央的政策本来很明确，港澳工委也很清楚，但当年的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却对香港工作常加干扰，他们也掌握了一些舆论阵地，例如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管了《人民日报》。”又说，“林彪集团和港澳工委就此钻了反英抗暴的空子，结果便产生无人负责也不能追究责任的局面。”⁴笔者认为，目前并无林彪曾对香港工作加以“干扰”的任何证据。“四人帮”在当时则远未形成（“四人帮”形成应在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更无从“干扰”。而且，在文革初期，《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大多经过周恩来

¹ 王为主编：《百年中英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9月版，页260。

²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版，页61-62。

³ 霍英东口述，冷夏整理/执笔：《世纪回眸 霍英东回忆录》，香港：名流出版社，2010年6月版，页122。

⁴ 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年9月版，页269。

的审阅，如《人民日报》1967年6月3日的社论，就是经周恩来修改后批准发表的。文革中极左路线的形成，首要负责的应是毛泽东。这是全党性的错误，不能往林彪、“四人帮”头上一推了事。

有鉴于以上种种，1967年5至8月间香港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史实重建工作，看来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将史实重建的原料，分为香港与内地两大部分。

香港部份，主要依靠的是香港中央图书馆收藏的中文报章缩微资料。这些报章，涉及到1967年这一时期的，有以下七种：《大公报》、《文汇报》、《明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华侨日报》和《工商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是著名左报（当时的左报还有《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但今天已难寻踪影），对左派的活动有详尽的报道。《明报》1959年由查良镛和沈宝新创办，强调客观和中立，文革期间，刊登大量文革消息，并对内地政局时有中肯评论。其余四份报章，被视为右报，而且部分版面损毁严重，字迹多难以辨认。故而，本书大量引用了较为客观、中立的《明报》的报道和短评，涉及左派活动方面，引用的是《大公报》、《文汇报》的报道。少量引用了星岛报系及《华侨日报》的报道。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发现，《大公报》、《文汇报》在报道中通常是两报共用同一的新闻稿，本书引用了其中之一，即代表了两报的共同立场。同时，为公允起见，本书对于同一事件可能会引用左派报章和《明报》观点、角度不同的报道，以资读者鉴别。

内地部分，除新华社发布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社论及外交方面的动态性报道外，主要还有：已公开的部分档案材料；时任广东省军管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所提供的“反英抗暴”有关问题的材料；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负责人吴荻舟家属收藏的吴荻舟个人材料，等等。相信内中不少材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对还原历史真相应有所裨益。

香港与内地两部分原料，对于史实重建来说同等重要。两者之间是密切不可分的，缺一不可。从分量来说，本书香港方面的材料会多一些，事件毕竟是发生在香港。内地材料相对较少，但尽量做到少而精，有时一份报告，则能说明很多问题。

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未能扩展收集更多的原材料。唯笔者认为，目前所能展现的这一部分事件发生当时所形成的材料，已基本可以重组 1967 年 5 至 8 月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起因、过程与结局。

本书力图以史实本身去说话，不做主观描述，在展现材料时少加评论甚至不加评论，而将笔者个人对事件的整体评论放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材料本身是客观存在，而推导出来的结论可以因人而异，笔者的评论，仅为一家之言，欢迎识者批评指正。

感谢蓝真、萧滋、吴辉、马海甸、陈博文等前辈、友人以及天地图书公司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2012年6月于香港

【书摘】

《香港，一九六七》

第三章 冲击 三、孟秋江之死

余汝信

1967年初，中共港澳工委常委、香港文汇报社社长孟秋江突然被召返京。孟秋江被急于召回北京的真正原因，至今还是讳莫如深的一个谜。据悉，孟秋江返京后被直接安排住进铁狮子胡同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62年已去世的李克农旧宅中。一个多月后的1967年3月16日，性格刚烈、处事果断的孟秋江，“果断”地结束了自己五十七岁的生命。

(左图：孟秋江夫妇与李作鹏夫妇) 孟秋江的夫人董世贤，辽宁绥中人。其妹董世珍（参加革命后改名董其采），是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李作鹏的夫人。姐妹情深，两家的关系也极好。据李作鹏的大儿子李冰天回忆孟秋江1967年初返京后的情形：



开始一段时间的周末，他们还有休息日。大姨父和大姨还来我家。我记得，他们一来就与我父母关门在书房中长谈许久。大姨父的脸色很不好，吃饭也很少。当时我父亲也是被批斗得焦头烂额。后来，大姨父被隔离在住处，只有大姨还来家中向父母谈谈情况。

1967年3月的一天，可能大姨打来电话，我突然听见母亲向父亲说：“老孟死了！”之后就听见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中撕心裂肺地大哭。多年以后父亲回忆道：“当我知道消息后，不禁泪流满面。对这样的‘革命’形势，对这样的疯狂局面，我在心中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们在家的孩子、秘书、警卫人员，都呆呆地围站在书房门口，谁也不敢进去。

几天后，我跟随母亲参加了大姨父的遗体告别。在冰冷的告别室中，大姨父安详地躺在灵床上。母亲搀扶着大姨走到灵床边。虽然有

中山裝領口和袖口的遮擋，但頸部和左手腕部包扎的紗布還是依稀可見。

遺體告別很簡單。中調部來人很少。除親屬外，主要是母親帶去的海軍的工作者。有父親的秘書溫棟盛，有海司辦公室副主任李凱，還有海政保衛部的幹部。

今年5月，我到廣東佛山看望老秘書溫棟盛時，他回憶說：“你大姨父的後事是我和李凱辦的，當時是你父親親自交辦”。¹

十三年後，1980年4月28日，姍姍來遲的孟秋江追悼會，終於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鄧穎超、胡耀邦、王任重、廖承志等送了花圈。孟秋江的生前友好等四百多人參加了追悼會。追悼會由新華社社長曾濤主持，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致悼詞。悼詞全文如下：

今天，我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這裡深切悼念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新聞戰線和情報戰線上的優秀戰士、前港澳工委常委、統戰部長、香港《文匯報》社長、我們的老战友孟秋江同志。

孟秋江同志是江蘇常州市人，生於一九一〇年，一九三七年參加革命，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的新聞、情報和統戰工作。歷任《新華日報》記者，國際新聞社代社長，上海《文匯報》採訪部主任，天津《進步日報》經理，天津《大公報》付社長，天津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一九六一年調中央調查部，同年派往香港。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孟秋江同志受林彪、康生、“四人幫”極左路線的迫害，含冤去世，時年五十七歲。

孟秋江同志家境貧寒，刻苦好學，從青年時代起他就投身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反動派不抵抗政策的鬥爭，在上海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一九三六年孟秋江同志開始從事進步的新聞工作，與范長江同志一起到寧夏、綏遠等地為《大公報》報導戰地新聞。為了宣傳抗日，他不避艱險，活躍在抗日前線，寫下了許多激動人心的

¹ 李冰天：《有關孟秋江夫婦的点滴記憶》，2011年9月3日。

战地通讯，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名记者。

孟秋江同志是较早参加战地报导的进步记者。在斗争的实践中他接受了革命思想，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加入到革命的行列，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积极拥护党的主张，勇敢、热情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作为《大公报》记者到延安采访，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写的通讯得到毛主席的好评。

抗战初期，孟秋江同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抗日救亡和进步的新闻活动，在新闻战线上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一九三八年孟秋江同志在汉口参与发起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主持“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战地文化服务工作，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记者。自武汉撤退后，在周恩来同志亲自筹划、领导下，孟秋江同志与范长江等同志一起在桂林创办国际新闻社。为了保证报导工作，孟秋江同志满腔热情地主动承担了社内的日常工作。国际新闻社与《新华日报》相配合，报导了抗日战争的真相和我党全面抗战的路线，扩大了宣传面，在国内外和华侨中产生广泛影响。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了国际新闻社。面对国民党的迫害，孟秋江同志勇敢沉着，领导社内的同志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同桂系势力周旋，为安全转移重庆、桂林的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到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孟秋江同志在斗争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组织决定改做地下情报工作后，孟秋江同志转战香港、上海，以银行董事长等公开身份为掩护，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和白色恐怖下，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矛盾，交结各方面人物，机智、勇敢、坚定地完成了党交付的任务，在联系输送干部、建立秘密据点、资助掩护同志等方面为党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孟秋江同志重返新闻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恢复国际新闻社的工作，他冒着危险联系、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网，向上海、天津、江西、山东等地报刊和海外华侨报纸发稿，揭露蒋介

石全面内战的阴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了动员人民的作用，有力地配合了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一九四七年孟秋江同志再次被迫撤到香港，他到香港后马上就投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革命斗争。在与中国民主同盟的统战工作中，孟秋江同志起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显著成绩。

全国解放后，孟秋江同志继续从事新闻、统战和情报工作。他忠实地、全心全意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情报工作路线，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他的任务，为团结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党的新闻事业，情报事业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贡献。

孟秋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是优秀的新闻战士和情报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不顾安危，不计名利，以革命为第一需要，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孟秋江同志对敌斗争机智、勇敢，立场坚定。待人宽厚、诚恳，善于团结同志和朋友。他襟怀坦白，追求真理，勤奋好学，是党的好干部。这样的好同志又正当年富力强，竟遭林彪、康生、“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致死，这是我党调查情报事业、新闻事业一个重大损失。我们悼念孟秋江同志就要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化悲痛为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努力奋斗。

悼词称孟秋江“遭林彪、康生、‘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致死”，是当时常用的套语，然而却非事实。孟秋江自杀之时，“四人帮”远还未形成，相信他的死也与从不插手军队之外具体事务的林彪毫无瓜葛。唯正如孟的好朋友冯英子所言：“十年大动乱中，被糊里糊涂夺去生命的朋友中，秋江之死是更加糊里糊涂的。他为什么要死？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死的？也几乎没有知道，他死了十几年之后，依然很少人知道，像一个不容易猜破的谜，永远在朋友们的心上打上个问号。现在终于为秋江开追悼会了，秋江呀秋江，但愿你在天之灵，真正安息吧！”¹

1

¹ 冯英子：〈枫落秋江冷〉，载陆诒、冯英子主编：《孟秋江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书摘】

《香港，一九六七》

第八章 结语：启示与反思

三、周恩来领导了“反英抗暴”全过程

5至8月间，周恩来有关“反英抗暴”斗争的主要活动及对“反英抗暴”的指导性意见如下：

1、5月12日，廖承志向周恩来提交了《关于香港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的初步意见》。周恩来代表中央随即批准了该报告，并于5月15日以国务院外办、外交部名义电告港澳工委、广东省军管会等遵照执行。

2、5月15日，由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面交英方的中国外交部声明，是周恩来批准的。¹

3、5月15日起连续三天三夜在英国代办处门前举行的由北京市革委会组织的百万人示威和5月18日十万人参加的北京市各界革命群众愤怒声讨英国当局迫害我香港同胞的暴行大会，是由外交部建议，周恩来批准进行的。²周恩来亲自参加了5月18日的大会。

4、5月下旬至6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召集有港澳工委和四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这是群众斗争，政府不参与。”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由国务院外办、外交部和中央调查部等抽调干部组成港澳工作的新机构，并指定由罗贵波负责。

5、5月24日、27日，周恩来约国务院外办、外交部和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据《周恩来年谱》称，周“强调在香港问题上同港英当局的斗争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的口号和采取的极左做法。”

6、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的社论，提出要香港左派“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

社，1994年12月版，页194。

¹ 冉隆勃、马继森：《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页81。

² 冉隆勃、马继森：《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页81-82。

统治！”这篇社论，是经周恩来修改后批准发表的。¹

7、6月6日，周恩来对香港“反迫害斗争”作了指示。周恩来称，“香港的方案今天定了，配合国内的政治、群众工作。”“总的原则，不搞总同盟罢工，不马上提出收回香港，一定要保留一手。群众运动的负责人要配合二、三线。香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不能在这次斗争中把力量全部都暴露了。都暴露了不符合党的原则。”

8、6月7日（或8日），周恩来向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传达了毛泽东有关香港问题的四点指示：一、弄不好，把第七舰队弄来了；二、拿回香港，几百万人还要吃饭，我们目前没有这个力量和精力；三、国际口岸只剩一个，需要出口一些物资，进口一些物资；四、香港是国际情报城市，它搞我们，我们也搞它的。毛最后拍板：“现在不打。”

9、6月9日，周恩来等接见温玉成。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周称：香港问题，考虑到中近东的形势不会发展那么快，阿联已接受停火，要防止美国在香港搞一下。群众运动还是按计划进行。部队移动的问题暂时停一下。

10、6月24日，在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强烈谴责英帝国主义对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残暴镇压”，对香港左派工人的“反帝抗暴大罢工”表示坚决的支持。

11、7月10日，周恩来在听取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汇报时谈及香港问题。周称，“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收回香港，只有苏修才挑，赫鲁晓夫提这个问题完全是为了挑拨，替美帝效劳。”“主席昨天讲了，还是不动武。”“现在香港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五十的居民上了街，只是搞定期罢工，你要是长期罢工，他就会找台湾人来接替。过去省港大罢工，可以使香港成为死港，现在情况不同了，时代不同了。”

12、8月19日，夜间，周恩来批准了中国外交部翌日向英方提交的48小时限时照会。²

13、8月23日，凌晨，周恩来等接见北京外事口造反派，严厉批评了外事口文革包括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左行为。

¹ 《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页82。

² 《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页82。

关于周恩来与“反英抗暴”的关系，冉隆勃、马继森2001年所编的《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一书，已经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该书收入了冉隆勃1996年以余长更的笔名发表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上的文章——《周恩来遥控“反英抗暴”内幕》，这是境外媒体第一篇客观介绍北京处理此案经过的文章。该书还收入了田恬写于2001年7月的《香港“六七暴动”与文化大革命》，对余长更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补充。这两篇文章，对后来的研究者启发良多。

田恬明确指出，“1967年香港斗争是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处理的，从5月到年底对香港斗争的各项主要措施是经过周恩来审批的。”¹田恬举了七个例子，以证明“北京介入香港斗争，是周恩来领导了整个过程。”笔者以上举了十三个例子，内中引用田恬的有四项，其余部分，为这十年来新发现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更印证了田恬这一概括性的观点。

田恬称，“周恩来不仅通过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同外交部西欧司港澳办公室²联系，并且在中南海西花厅多次接见外交部有关领导、港办工作人员和港澳工委的人员，直接了解情况，探讨对策，给予具体指示。在内部讨论中，周的态度同官方的对外表态显然是有距离的，周的态度有摇摆，整个案件处理过程有曲折。”³笔者赞同田恬的以上说法；需要补充的是，在内部讨论中，周的态度同他自己的对外表态也有距离。

例如，关于罢工问题，田恬称，“周恩来既了解中央对香港长期利用的方针，也了解香港的现状，而对港澳工委提出的罢工计划和乐观估计持怀疑态度。”田恬又称，“5月30日周恩来接见港办和工委代表，外长陈毅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⁴都在座。审查方案时，周摇头说：如果罢工的规模能够达到十万人到十五万人，那就很不错了。他不相信能够达到二、三十万人的规模。至于形成总罢工，使香港瘫痪，周认为更是不可能的。他指出：现在的情况同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已有很大不同。罢工者不能像当年那样回到内地，香港经济已经同国际经济结成一体，要使它瘫痪、停顿，是不可能的。谈话中，周忧心忡忡地几次

¹ 《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页81。

² 余长更的文章称新机构定名为“外交部港澳办公室”。

³ 《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页81。

⁴ 廖应为外办副主任。

提到,‘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¹周恩来以上讲话精神,与6月6日、7月10日内部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6月6日的讲话中,周恩来更明确称“不搞总同盟罢工”。但在6月24日卡翁达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却又称,“香港的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农民、渔民以及其他爱国同胞正在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结成浩浩荡荡的反帝抗暴大军。今天,他们开始了一场规模宏伟的反英抗暴大罢工,我们表示坚决的支持。”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外差别?这是否体现了周恩来在文革特定环境下的一种无奈?值得深入探究。

关于“六三”社论,田恬称,“当周恩来看过王力对《人民日报》的讲话和《人民日报》根据这个讲话起草的六月三日社论后,他没有像陈毅说的那样讲话,相反,突然宣布会不开了。不但会没开,而且他把社论修改发表了。这个社论虽然口气比原稿有所缓和,但关键是还在给香港斗争鼓劲,而且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是原稿中的话,未经改动。这无疑对香港斗争产生重要影响,造成了要收回香港的错觉,加强了对港英的斗争。”周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转变,田恬分析道,“前面提到,周曾经担心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当时别人还没有提出,他当然不是随便讲的,作为总理他必须估计到各种可能。接近毛泽东的中央文革的王力对《人民日报》讲话是否反映了毛的最新意图?他要不要跟上?是不是想当时就利用这个机会把香港拿回来算了?这联系到当时一些军事考虑和行动。”³

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中央最高层当时确有采取军事行动的考虑。“六三”社论已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六三”社论发表没几天,毛泽东又明确表态“现在不打”,惟“六三”社论造成的影响,已难已收回。

关于限期照会问题,余长更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外交上发出的第二个具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照会。……在外交上提出‘最后通牒’是一件大事情。英方如不取消禁令,释放被捕的记者,中共方面将怎样对付呢?中方没有向英方施加压力的有力手段,当时的底牌是:如果英方拒绝,中方将把英国驻华代办处负责新闻工作的二等秘书驱逐出境,如此而已。”“这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恫吓,一着不高明的棋子。周恩来没有考虑到还会有其他什么后果,就批准了

¹ 《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页84-85。

² 《人民日报》,1967年6月25日。

³ 《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页85-86。

这个照会。外交部于二十日将照会提交英驻华代办。”¹

余长更又称，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周恩来二十二日深夜²紧急召见外交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听取当天下午³发生的事件的汇报。周大发雷霆，批评红卫兵不负责任的行动，批评外交部人员没有尽到说服红卫兵的责任。他说，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懂得，外国使团的办公处是不可侵犯的，驻在国政府有保护外交人员人身安全的责任。他又责备外交部‘港办’，认为它不应该提出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他责备外交部直到香港当局要宣布对被捕记者的判决前夕，才匆匆忙忙把照会交给他审批，使他没有多余时间考虑。周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这是他的责任。他又问，新华社电讯如何报导这件事。此事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最后他同意采取这样的说法：当48小时期限满后，革命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⁴

唯据笔者所见到的周恩来8月23日凌晨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等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的讲话记录中，并没有上述这些话。但据《周恩来年谱》，周当天还与外办、外交部的负责人谈了话。⁵所以笔者对余长更所称周恩来“他又责备外交部‘港办’，认为它不应该提出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周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这是他的责任。”这一整段话的真实性虽有所怀疑，但觉得还是应录以备考，以待日后的研究者能有更深入的查证。

¹ 《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页48-49。

² 应为8月23日凌晨。

³ 应为8月22日夜晚。

⁴ 《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页50-51。

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页182。

【书讯】

马文蔚著《难忘的“现反”经历：1966--1979》一书问世**孟友楼**

这是一位新闻出版人撰写的文革经历，作者马文蔚，1940年出生于北京，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文革伊始，她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本单位的造反派揪出，从此沦为专政对象。一年半后，又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出狱后，又遭到“群众专政”，1960年代末期至1973年，唐山学习班和五原的“五七干校”吞噬了她四年多的青春年华。

此书分为五部分，各部分的小标题：第一部分“风暴骤起”（1966年6月至12月），第二部分“罪上加罪”（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第三部分“牢房岁月”（1968年1月至1968年9月），第四部分“群众专政”（1968年9月至1969年12月），第五部分“唐山 五原”（1969年12月至1973年1月）。在书末，有一个“简单的结束语”。

一、我在内蒙古度过了十八个年头，把最年轻、最富精力的一段生命“贡献”给它了。而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灾难就占去了其中一半以上的岁月，岂能忘记！

正式平反，恢复了我的“人民”属性。人民——敌人——人民，经历十三年之久，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处。而此时的我已非昔时的我。1979年1月党组织通过我入党，是从组织上体现“平反书”中“政治上完全予以信任”的许诺，其中也有种不言而喻的补偿。要说我的内心感受，正像一本名著里说的，愿望终会实现，而实现时已变了滋味。这时的我，没有了以往的单纯。对曾经视为伟大、崇高、神圣并努力追求的东西，产生了种种疑问。

我的遭遇，与内蒙“文革”三大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二月逆流”、“新内人党”的集团冤案相比，只是零散、“个别”的小事。“冰山一角”都够不上，算个小冰渣子吧。而对于我个人——今后该如何看待自己和这片立足之地，就是百分百的大事。

我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懂事起，就以“无产阶级革命”为神圣，以

“又红又专”为目标。天天都在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时刻不忘“思想改造”。为什么仍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文革”被揪斗，是因为“思想”。从“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毛笔字开始，再到“对领袖人物也要一分为二”的自我辩解，未涉及如何“分”的实质性问题，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列宁头像及字，虽是个捏造的伪问题，也很够典型。说明某些领域不能碰，某些问题我们没资格去想、去议论。

“文革”并非起始，可以追溯到“反右”或更早。有人总结出“反右以后不开口”。反右时我正在高三最后一个学期，还不省事。一进大学校门就是“反右补课”。操场和路边到处是大字报；院子、饭厅随处可见“右派”学生被围攻。所谓“右派”，还不是想了不该他想的事，说了不该他说的话？新生参加高年级的批斗会，警告你“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深蒂固，不努力改造，你也会成为右派，成为人民的敌人。大学的几年，都是在“改造”、“斗争”的浓烈气氛中度过的。大学的思想教育，实质就是“甘当螺丝钉”和“听话”教育。

“听话”与否，是那个时代衡量一个人政治觉悟的核心标准；能否成为“驯服工具”，是先进与落后、“成品”与“残品”、“废品”的分界线。你还能有多少自由的空间？你还敢有多少创造性思维？

现在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离真正的知识分子远矣！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高标准，更是远之又远。

二、文革中，无论什么人，都被卷进“派”里。“造反派”、“保守派”、“走资派”，打得不亦乐乎，乱成一团；好人、坏人不以道德和行为分，而以站队分。这里写到的造反派做坏事很多，并非仅仅因派性作怪。而是他们占领了革命的制高点，有了权，可以说一不二，没人敢反对，于是就无法无天起来。他们以革命的名义行私，干了以前想干而不敢干的事。老保一旦掌权，不知自律，也没什么两样，如小分队的李××。等到尘埃落定，人们不再关心曾经的站队，而是以正、邪、善、恶的标准而论，又是另一种判断了。关键时刻，会突显人格高下。平时看着不起眼、毛病很多的人，会在霎那间放射光芒，使人敬佩不已，从此刮目相看。

但无论何人，掌握了权力，仅凭自身的道德未必可靠，要有法律的约束和多方的监督，才有可能不做坏事。

三、文革过后平了反，却不是我当异类的结束。反“自由化”时又捎上了我。其实我没做“犯错误”的事，只是在一位局领导面前，对当时的“宣传纪律”说了一句不敬的话。多少年了，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仍严重存在着以思想和言论获罪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人们普遍觉悟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期待着政治改革尽快到来。

文中写到的很多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好人、好同事，我常常怀念他们、感激他们；如有灵魂，自有相见之时。做过一些坏事的，我也希望他们能真诚地反思和忏悔，否则难得安宁。

书后有两个附件，其一是1978年6月2日内蒙古广播事业局给作者的平反书，其二是1979年8月3日内蒙自治区公安局给作者的平反决定。

此书由北京时代弄潮发展文化公司编辑出版，2012年3月问世，北京海淀图书城有售。

【书讯】

余汝信新著《香港，一九六七》出版

向胡杨

今年7月，《香港，一九六七》问世。该书第一次披露1967年5至8月间，香港的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发动工潮，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市，以至在公共场所安置真假炸弹等“反英抗暴”的历史，挖掘了隐藏在这一事件背后的罕为人知的史实，并深入剖析了中共中央的对港政策。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介绍了历史背景：五六十年代的中英关系，中共关于香港的政策和主管机构，以及发生在1966年的“天星小轮加价事件”。第二章描述了作为“反英抗暴”前奏的澳门“一二三”事件。第三章讲述了文革对国务院外办及外事口的冲击，以及广东的动荡对香港的影响。第四、五、六、七章分别记述了1967年5月、6月、7月、8月的“反英抗暴”情况。第八章对这一事件做了总结和反思。

该书的作者余汝信，是著名的文革史专家。这部书不但展示了他对这一段特殊历史的熟稔，而且凝聚了他对香港现状的观察与思考。该书的封底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本书作者）移居香港二十多年，在研究文革大历史的过程之中，作为一名香港学者，他敏锐地发现内地及香港论者在叙述及评估这段历史上存在缺陷，不足与差距。因而他试图依靠香港与内地两地的文献资料，以客观公正的立场，重构还原这段史实。本书功力扎实，论据充分，其中有许多第一次披露的资料，不失为研究文革与香港的一部力作。”

该书由香港资深出版公司“天地图书”推出，售价158港币。

【检讨与揭发】

胡乔木和吴冷西的关系

李慎之

1968-9-12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看到大字报，知道吴冷西在1957年因为男女关系问题，1959年因为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两次犯严重的错误，都被胡乔木包庇过关，这些黑关系都是我本来不知道的，都是，就我所知，吴冷西的飞黄腾达，至少在1957年以前，有三次关键时期，都是出于胡乔木的“栽培”与“提拔”。

第一次是1948年秋天，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达平山与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央工委合并以后，胡乔木奉命（到底是奉谁的命，我们当时不清楚）直接抓新华社的工作，新华社社长廖承志被撇在一边，只管行政不管业务。在胡乔木的领导下，首先就改组了总编辑室，把原来属于总编辑一级的范长江、石西民、梅益、悬空挂起，而以原来仅属于部主任一级的总编辑室秘书吴冷西提拔为总编辑室第一主任，全面掌握发稿大权。这是吴冷西超越原来的同级干部，而成为新华社中坚干部中的首席人物，奠定了后来成为新华社社长的基础。当时，除了在延安时代，胡乔木曾一度领导《解放日报》（吴冷西当时任国际版主编），因而同吴冷西有些渊源而外，胡乔木主要是通过在西柏坡集训新华社业务骨干而瞧上了吴冷西，此后就一直把吴冷西当作自己的接班人。吴冷西也从此时起感激图报，“言必称乔木同志”，一直把胡乔木当作自己的“恩师”看待。以后吴冷西在1948年升为第一助理总编辑，1949年升为第一副总编辑，1950年升为总编辑，1951年升为副社长都只是名义上的升格，实际地位早在1948年就由胡乔木给他排定了。

胡乔木用人是很注重资历与名望的，在1952年以前，在他心目中，还是以陈克寒为新华社的第一把手，因为比起陈克寒来，吴冷西还是“后生小辈”，但是1950至1951年，陈克寒嫌新华社社长“官卑职小”坚决不干，胡乔木也感到陈克寒桀骜不驯，而吴冷西则温驯听话，就决心让陈克寒“升官”，去当出版总署的副署长，而以吴冷西为代社长，并在不久以后出任社长。这样，在吴冷西与胡乔木之间，就少了陈克寒这一层关系，而吴冷西也就成了胡乔木的直接接班人。

这对吴冷西后来的“发展”也是有决定性的。

胡乔木是以“新闻”起家的，虽然他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影响，手也伸得很长，但是抓得最紧的始终是新闻界，他的得力干将，不论在哪一界的，差不多都是新闻界出身。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新闻界的人就都已经认为吴冷西是胡乔木的接班人了。但是胡乔木之所以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因为他长期从事起草中央文件的工作，是所谓“掌握政策”，“写大文章”的人。就我所知，一直到1956年以前，吴冷西是没有参与过这种重要工作的。吴冷西第一次参加写“大文章”成为“秀才”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我党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吴冷西由于胡乔木的罗致，参加了这两篇文章的写作班子，由此成为刘邓黑司令部著名的黑秀才之一，而且由此得以列席连一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能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成为所谓“通天干部”，窃取了巨大的政治威望，而以之作为他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资本，这是胡乔木对吴冷西又一次决定性的“提拔”。

1957年，人民日报当时的总编辑邓拓，因为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鸣放的方针，而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胡乔木当时曾代表中央检查人民日报的工作，对邓拓进行百般庇护，但是，大概他也看到邓拓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决定走马换将，以吴冷西代替邓拓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仍兼新华社社长），向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两单位部主任以上人员宣布中央任命的会议，是直接由刘邓黑司令部的“副帅”邓小平主持的，胡乔木也出席为吴冷西撑腰。我还记得那次会议是1957年7月4日，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举行的。邓小平在以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宣布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以后，大概因为早已意识到吴冷西年轻资浅，难以压众，就说，“有同志说，人民日报总编辑至少要由一个中央委员来担任。我们原先也如此想，但是找来找去，实在没有合适的人。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冷西同志合适，反正他的工作是在我们直接领导下嘛”。一语道破天机，邓小平在这里明白宣布了吴冷西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邓小平接着还谈了反右斗争的形势，一面把“文艺报”和“中国青年报”，称之为“大字报”，一面却给在鸣放期间发表了许多全国著名的大毒草的人民日报开保票说“我们检查了这一段时期的人民日报，还没有什么问题，只有袁水拍攻击左叶的那一首诗不大好……但是，对我们的批评，

根据党章，你们（指当时在座的袁水拍）也可以保留嘛！”现在回头看，这分明是给吴冷西上台以后的办报方针定了调子，要吴冷西继续执行胡乔木和邓拓原来的那一套修正主义方针。在邓小平发言之后，胡乔木也讲了话，反复说明吴冷西可以胜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工作。他特别提出吴冷西的优点是“既谨慎又敏锐”。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完全不是毛主席早就为我党规定下的挑选干部的方针，而是胡乔木为刘邓黑司令部挑选干部的方针。在那次会议后，就有人议论说：“乔木给冷西下的四字考语是‘夫子自道’”。事实上胡乔木就是凭他的“谨慎”和“敏锐”的手腕，才爬上那么高的位置，而长期掩蔽了他自己的修正主义面目的。

这次会议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胡乔木。胡乔木和吴冷西以后的关系，我已无所闻知，因此只能写到这里。

（李三达供稿）

【資料】

湖南土改（三）

任冬林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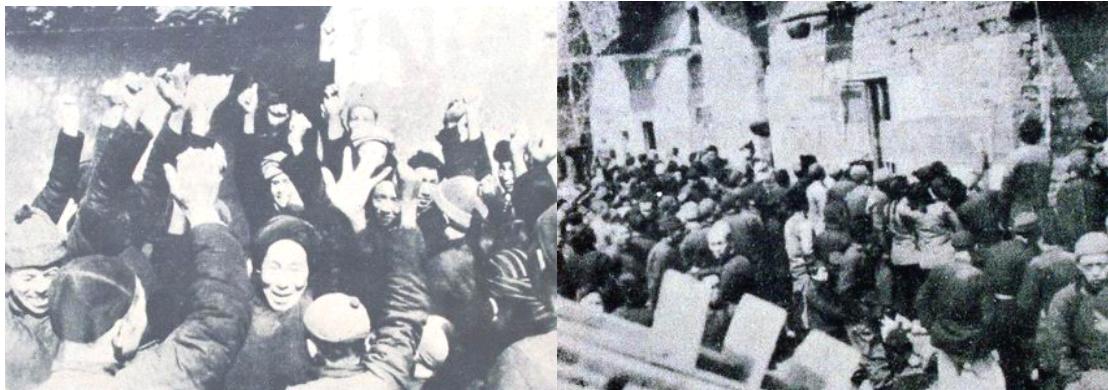
通过农协委员，代表小组会，反复交代没收征收政策，说明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的道理，贯彻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追回应没收的封建财产。阶级成分经过三榜定案后，农会开始进行没收、征收。这是长沙县郭公乡农会在没收地主的房屋。



“没收农具聚成堆，翻身农民笑颜开”。这是宁乡鹤林乡没收来的农具。
桂阳七区农民正在挑运没收的余粮。（下图）



分配时，首先做好教育动员工作，通过大会小会，广泛展开讨论，诉苦、算翻身账，使群众知道翻身搭帮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根据群众自报公议，多数通过的意见，发扬大公无私互助友爱的精神，进行分配。下图左：宁乡鹤林乡农民一致举手通过分配办法。下图右：郴县华塘乡农民在看分田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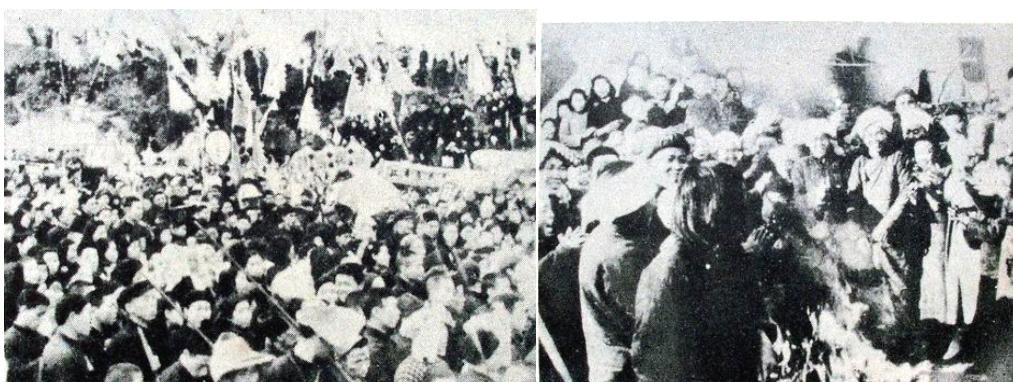
各民族团结友爱，亲如一家。下图左：资兴滁口乡农会欢迎瑶胞兄弟下乡分田。下图右：祁东洪桥乡雇农彭美石分得了他父亲被迫卖给地主的水田，高兴地说：“感谢毛主席，土地回了老家”。



桂阳人和乡的一位老太婆，在分得的大水田里插上坯牌，她激动得流着热泪说：“我活到七十二岁，今天才有了自己的田”。



左上：分得新犁，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右上：农会正在分配没收来的余粮。



左上：长沙百绿乡农民庆祝土改胜利。右上：岳阳筻口乡农民烧毁旧地契。



左上：“翻身不忘毛主席，永远跟着共产党”。宁乡鹤林乡农民在翻身大会上举手高呼口号。

右上：祁东洪桥乡雇农陈运厚，全家看着毛主席的像，他妻子感动地说：“毛主席呀！你真是救命的大恩人”。

【编读往来】

1、阎长贵、宫婷婷谈唐伟的文章

《记忆》编辑部：

《记忆》86期唐伟的文章《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以下简称唐文)确实写得很好。从宏观上说，他对文革过程、原因、责任等分析很深刻，论断很到位。关于清华一些具体恩怨、是非，我没法发表意见，但看后觉得很有收获。唐文文字精炼、精彩，从思想到表述都是很难得的好文章。感谢作者。从1966年6月份即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1966年12月改名为：办事组)工作人员、1967年1至8月任办事组组长、现已82岁的王广宇先生说：唐伟的文章好，实事求是，文字生动，很吸引人，一读就要一口气读下去；他托我转达他对作者和编者的敬意。

对唐伟先生的文章我是非常肯定的。但我觉得，该文对有些事实的记忆和叙述不够准确，现就我所知和看到的提出来，仅供参考。

唐文中提到“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过去总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如果说这句话有夸大毛泽东的作用，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个人崇拜的因素和成分，而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用以说明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对这一点仿佛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我个人认为，承认这一点，认真地分析这一点，这是考察和研究文革所有问题，特别其中重大问题的关键所在。

唐文：“时任北京新市委二把手的吴德，在他的回忆书中竟然指认蒯大富是清华“8.24”的肇事者。那些说违心话保官、有了权就栽赃的“老革命”们，我要对你们说一句：“我鄙视你们！”如孙怒涛所言：“恐怖、即使披上红色的、革命的外衣，也涂不上正义的色彩。”我觉得唐文对清华“8·24事件”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特别文中提到王任重，十分难得。王任重在北京的文革初期确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研究北京文革不应忽略的。

唐文在谈到清华“八八”事件时写道：“‘八八’的目标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作用和意义就在于它是清华第一个群众自发的对抗上级指定的‘临筹’组织。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原旨或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仿佛没有“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论述。我记得这个论断是林彪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唐文：“1967年4月10日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周恩来的退让，说明中央对刘少奇斗争的升级。后来老蒯对我们说，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不知是哪个小子的鬼主意”。我听说这是江青的主意，在《问史求信集》中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中对此事被江青操纵有详细的说明。

文革以后，对造反派批斗老干部只有谴责，除了造反派自己，几乎没有分析其中值得理解和肯定的因素。读建国以来历史，历次运动，他们整了多少人，害了多少人？难道不该批？说实话，对其中有些人，判刑都不为过。当然，文革中的人身迫害，比如喷气式戴高帽等等方式不应该，那是另一回事。

唐文：“为陈里宁翻案，就是为打倒刘少奇造势，为给刘少奇定案增添筹码。陶德坚只是土建系的普通教师，她怎么知道陈里宁并这么感兴趣的？她怎么找到安定医院和公安部十三局这个保密单位的？她如何下决心挑头去抢档案的？”其实，陈里宁的事是王力、戚本禹指使的，具体执行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王广宇。此事在《问史求信集》中的《陈里宁“反革命案”始末》有较详细的叙述。

唐文：“‘联动’矛头是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尤其看不起‘戏子’江青和‘十七级大干部’戚本禹。”据我所知，当时戚本禹的级别是行政十六级。

唐文：“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受中央文革差遣，去四川揪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元帅，地院的红卫兵捷足先登，抢在北航之前将彭元帅弄回了地院。地院的头头朱成昭是一个人格健全、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和囚禁中的彭元帅几番长谈下来，得出结论：彭德怀是正确的，毛主席错了。……在深圳饭局上，凡是见过韩爱晶猥琐表现的清华校友，都为你老孙推崇韩爱晶的美言和相信韩爱晶的谎话而感到脸红。”对揪彭德怀事的叙述不准确，揪彭不是北航在前，而是地院在前，也不是朱成昭和彭谈话，认为彭对毛错，等等。关于揪彭的事，首先是我奉戚本禹之命（当时我就认为这不是什么戚本禹的命令，觉得他再狂——戚本禹在文革中确实很张扬，也不敢下这样的命令，我诚心诚意地觉得这

是去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去找朱成昭,朱派人去成都做这件事情,原来他并没和彭直接谈话,彭不该揪,这是直接去揪彭的人的认识,他们还搞了材料,报给朱成昭,又报给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说:“叫他们去揪彭,他们却被彭征服了!”于是他又给韩爱晶打电话,叫他们去揪……说韩爱晶无人性、无人格,也似值得斟酌。

唐文:“闯了祸的陈再道跟随周恩来回到北京,没听说受了处分;风头正劲的王力、主持全军文革的关锋”。我认为:关锋是军委文革成员之一,但说他主持全军文革,没有根据。

唐文:红卫兵、工农兵,“两兵”大学生占领上层建筑,名为领导“斗、批、改”,实为充当打手、炮灰。最后由“梁效”写作班子吹响战斗号角,从清华、北大向全国掀起“反右倾回潮”、“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

事实上,这几次运动的次序似应为:“批陈整风”、“反右倾回潮”、“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

阎长贵

2012-7-31

《记忆》编辑部:

我是清华的在读博士,对母校的历史我一直十分关注。尤其是清华文革时期的历史。我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反思清华文革的文章,原来我认为,陆小宝先生的文章是最好的。今天在贵刊看到了唐伟先生的大作,虽然长,但还是一口读了下来。如编者所说,这篇文章确实在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它不但对了解清华校史有用,对思考毛泽东时代的教育也大有帮助。

宫婷婷

2012-8-13

2、 补正

经读者来信询问,编者才注意到本刊第86期上的一个疏忽——李慎之先生的《交代我和吴冷西的关系并揭发吴冷西的反动言行》一文,没有标明此文的写

作时间。经请教李三达先生，得悉此文写作于1967年7月10日前后。特此补正并向读者致歉。

《记忆》编辑部

2012-8-15

